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难忘的故事

“七·七”事变

第七册



难忘的故事
“七·七”事变

西安事变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星转斗移，天地翻覆，而西安事变仍然深深烙印在共产党、国民党的历史上，双方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它、研究它、探测它的前因后果，复杂含义。

西安事变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西安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逼蒋抗日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称“双十二事变”。

我党自瓦窑堡会议后，对东北军和 17 路军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在西北地区实现抗日大联合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敌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希望同他们首先停战，联合抗日。4 月 9 日，党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等到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初步达成了停战协定。八、九月间，党中央又派叶剑英、彭雪枫等到西安进行工作。在此前后，党中央先后派南汉宸、汪峰、王世英、王炳南等与杨虎城多次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9 月 22 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这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停止了敌对行动，形成了西北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同时，又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广大官兵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蒋介石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拒绝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而且调遣嫡系部队 30 个师到了豫陕边境，“围剿”红军，防范东北军和 17 路军，还两次坐镇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

10 月的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及侍从室主任等一行由南京飞抵西安。当天下午即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除了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和 17 路军的部分军、师长。

蒋介石脱去了长袍、马褂，穿上了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铮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股温文尔雅和闲情逸致，显得威风凛凛，甚至透着几分杀气。走进会议室，他威严地朝到会的将领们扫了一眼，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上就位，然后招呼大家坐下。他清了清嗓子，板着脸孔说：“请诸位到这里开个会，讲一讲我到西安的来意。这么说吧，四个字：围剿共匪！”

接着他又不无生气的说：

“东北军开到陕西来剿匪，为时已整一年，迄今战果甚微，赤患不仅没有根除，反有向河东、关中蔓延之势。所以我这次来陕，一方面想了解进展迟缓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部署新的围歼，决定调集 30 万兵力，配备 100 架战斗机，力争在二至三个月内，把共匪聚歼于陕甘边境。现在，我们先谈各自的意见。”

蒋介石的话音一落，张学良便“唰”地站了起来，他显得有些激动。为了向蒋介石陈述意见，他已经憋了好些天，今天到了说话的时候了，一开口，声音都有些发颤：

“委员长、请允许我发表几句不同的意见。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觉得这种同胞之间互相杀害、消耗国力的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去年秋季以来，中共多次公开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就在这月 5 日，毛泽东先生和周恩来先生还联名给我来信，要求我向委员长转述他们的意见，要求国共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互

派代表谈判。我认为中共的表示，绝不是虚情假意，也不是搞政治圈套，完全出于至诚。所以，我在这里向委员长再次请求。这不仅是我张学良一个的要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意见和要求，请委员长明察！”

蒋介石的鼻翼翕动着，铁青着脸，显然在尽力抑制着怒火，他偏过头望着坐左首的杨虎城，声色俱厉地问：“虎城，你也是这样认为吗？”

“是的，我也有同感。”杨虎城身子扭动了一下，瞟了蒋介石一眼，也站了起来，“17路军全体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却士气低落。”

“士兵还不是听你们的，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会动摇吗？！明确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我们既定的国策！”蒋介石说罢，起身离座，气咻咻地朝门外走去，留下了一串“笃笃”的马靴声，屋内留下了沉默和遗憾、愤懑。

几天后就是蒋介石的生日，张学良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已产生了隔膜，但为着抗日，他顾不了许多了，在蒋生日的当天，他又向蒋介石力陈抗日的道理，他慷慨激昂，又一次刺激了蒋介石。

“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蒋介石正色地说，“我给你说过，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轻重缓急。现在很明白嘛，共产党就在你们的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必须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作为军队统帅，怎能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把剿共放到一边呢？如果我们抗日，共匪正好趁机夺取一省至数省胜利，那我们不是成了天大的傻瓜吗！再说，共匪已成强弩之末，用不了多久就可一举消灭，消灭了共匪，不就永绝后患吗？”

“消灭共匪，谈何容易？”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我和共军作战一年了，不但没消灭，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个师……”

“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坚！更应由此吸取教训。”蒋介石提高嗓音，声色俱厉。

“我们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广大官兵的家乡落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到西北来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起来！”张学良越说越激动，眼珠子都红了。“而共产党却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进行的这场剿共战争，到底有多大意义？红军能不能被剿没？共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一派胡言！”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谈话又一次不欢而散。

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防共协定，国际、国内形势愈加紧张；侵华日军肆无忌惮，使用飞机轰炸平地泉，并配合汉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原内蒙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和李守信（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占领了绥东重镇百灵庙。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率35军及绥远人民奋起抵抗，在红格尔图一带把日伪军击溃，强行收复百灵庙，这一局部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心，也大大激发了有失土亡家之痛的东北军官兵的士气。东北军中更强烈地响起了“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有的高级将领乘机向张学良进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中央政府不准许，我们也要自行出兵援绥才是。”

面对绥远抗战的胜利和全国援绥抗日运动的蓬勃兴起，张学良更加坐卧不宁。自从洛阳回来，他的情绪一度十分沮丧，甚至产生过用辞职来表示自

己对当局的忿慨和不满，现在他的劲头又鼓起来了，并且为自己的消沉情绪感到羞愧。个人受点委屈毕竟是小事，抗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是至高无上的大事。他一方面积极同红军、17路军秘密联系，筹组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作出兵的准备；另一方面仍然寄希望于最高当局，能够批准他率部开赴前线参加抗日。11月27日，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请缨抗敌书”：

委员长钧鉴：

叩别以来，瞬将一月。此间委座亲赴晋鲁，指示一切，伏想贤劳，极为钦佩。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为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殒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此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衍，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署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以为，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荷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企祷之至！

张学良 敬叩

11月27日

12月2日，他的请缨抗敌书终于批下来了，信头上写了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张学良更感到了茫然。

1936年12月4日，西安火车站及其站前大街突然戒严，站台上和站前广场遍布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给人一种紧张而恐怖的感觉。下午3点钟，一列专车徐徐开进火车站。

对张学良不放心，剿共心切的蒋介石又一次抵达西安。

晚饭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来到张学良家，他脸色阴沉，心事重重地说：

“副司令，委员长这次来西安，我看情况有点不对头！”杨虎城呷了一口茶水接着说：“方才一到临潼华清池，他就布置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让晏道刚给他开一个东北军和17路军的师以上军官名单，从明天起，他要挨个儿接见，训话。”

“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轻轻地嘀咕，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杨虎城。

“威胁、利诱、分化、瓦解，挖你我的墙基呗！”杨虎城忿忿然地说，“另一件事，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立即用电报通知陈诚、卫立煌、蒋鼎文、

朱绍良、万耀承、邵元冲等高级将领，到西安来开军事会议，部署对陕北的红军进行第六次大围剿！”

“看样子，委员长这次到西安来，是要撇开东北军和 17 路军亲自调兵遣将，进攻陕北！”张学良站了起来，右手托着下巴，一边在房内踱步，一边思考着。

“嗯，是这样，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蒋这次是铁了心了。”杨虎城说。

“他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一点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太叫人伤心了！”张学良叹息地摇着头。

“你对他一直抱有幻想，我早就把他看透了。他和共产党不共戴天，要他放弃反共是不可能的，白费唾沫！”

“眼下就要动手了，虎城兄，我们该怎么办呢？”张学良站在杨虎城面前，心急如焚地说。

“副司令，我倒要先问你一句：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杨虎城的态度突然变得十分严肃。

“这一点你还怀疑吗？我可以对天发誓：坚决抗日，绝不退缩！”张学良斩钉截铁地说。

“既然如此，那我就给你献上一计！”杨虎城的心怦怦地跳着，睁大双眼瞪着张学良，像要从张学良的脸上辨别他决心的真伪，接着又朝门外瞅了瞅，见没有任何人，这才上身前倾，凑近张学良身边，无形中握紧了一只拳头，声音低沉而坚定：“等老蒋进西安时，我们给他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张学良大吃一惊，他的心一阵紧缩，半张着嘴巴，半晌没有吭声。

“副司令，我相信你！相信你的爱国心会超过你的个人感情！你我若不是心心相照，我今天说下这个话来，不是寻着让人杀头吗！”杨虎城站起来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四只火辣辣的眼睛互相对视着……

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几天之内，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以及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蒋百里、张冲接踵而至，猥集西安。一时间，西安城火药味十足。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活动频繁，又是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围剿”方案；又是找东北军、17 路军的将领安抚拢络。可是却把东道主张学良和杨虎城撇在一边，不加理会。沉着、稳重的杨虎城倒还罢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无法忍受，一种被抛弃、被冷落的感觉，紧紧攫住了他的心。

12 月 7 日下午，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对蒋介石进行一次最后的谏。

一见面蒋介石就满脸的不高兴，打着官腔说：“陈述什么，还是以前的那些话么。”

“是的，还是那些话！”张学良声调铿锵地说，“日寇贫血我国，贪得无厌，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国西北，国家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上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的老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请委员长三思！”

“哼！”蒋介石气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你说，再说下去，把话都给我说完！”

“委员长这些年不惜牺牲一切来围剿共产党红军，只是抵消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这样只有利于敌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人家有鲜明正确的抗日主张，是爱国的，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联合，只要我们确立抗日的国策，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共产党是可以合作的，是能够听从领袖的命令的。”张学良越说越激动，眼泪噗籁噗籁地往下滴，“委员长，学良的陈述完全是从党国利益出发，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的恩怨。想当年国父孙中山也搞过国共合作，委员长是当今的总裁，仿照国父的先例，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国难期间的唯一办法。”

“一派胡言！”蒋介石越听越刺耳，手往三斗桌上狠劲一拍，大发雷霆，“你知道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过俄罗斯实地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过去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最后时候了，你是个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敌人，和他们搞联合，还有点军人气概吗！‘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心！”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不敢稍怠。而‘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各方面怨谤，集中在我一身，只有委员长体谅我保全我。我也认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国家民族的事业，即使我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委员长对我的厚待。”张学良涕泪皆下，说到动情处，以至泣不成声，“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日还是分裂内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以及个人的荣辱都是成败的攸关，我以为，委员长必须悬崖勒马，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振兴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痛哭失声的泣诉，丝毫没使蒋介石动心，他气得五官都挪了位，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待张学良说完，便撇着嘴角，冷笑着说：“你中国共产党的毒太深，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要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要叫你往西，你就得往西；我要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你是军人就得服从。”

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冥顽不化，既生气，又失望，伤感到了极点，不禁抱着头失声痛哭起来。

蒋介石也斜了张学良一眼，默默地摇了摇头，待张学良感情稍微平静一点后，说：“我明白地告诉你！东北军和17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服从‘剿共’命令，全部开赴陕西前线进攻‘共匪’，中央军作为你们的援军；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就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围剿’。你们嘛，立即撤离西北，东北军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这两条路何去何从，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剿共”决心已下，再说也无益，只得站起来，擦干眼泪，悲怆地朝门外走去。

经过了这次激烈的争论，虽然很不愉快，但此刻的张学良却产生了一种轻松感。他想：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得起他蒋介石，从今往后，我要凭自己的良知去干一个中国军人应该干的事情，肝脑涂地。义无反顾，再也

不拖欠他什么了。

从蒋介石那出来，张学良就直接去了杨虎城那里，见了杨虎城，张学良便说：“虎城兄，还是你比我看得远，看得透！我今天劝谏又挨了一顿训，他已经和我们摊牌了！老蒋先把我们调开，紧接着肯定就是整编，三整两整我们这两支队伍就全完了，这是他对付杂牌部队惯用的伎俩。再说，这样做势必使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结成的至诚合作毁于一旦，我们的抗日夙愿将无从实现，一年来为在西北形成抗日局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就全落空了！”

“嗯，是这样的。”杨虎城脸色严峻起来，“他这是逼着我们上梁山啊！”

“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办法，挟天子以令诸侯！把他扣起来，逼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只要他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绝对不难为他，还拥护他当领袖。”张学良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就这样！这件事关系重大，可说是惊天动地，我们要周密考虑，准备承受巨大的、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军事上的压力。”杨虎城脸上挂着刚毅的神色，坚定地说：“副司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了抗日救国，就是牺牲东北军和17路军这两个团体，我看也值得！你放心吧，我们17路军全体将士坚决和你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听你的指挥，服从你的命令，决不畏惧，决不退缩！”

张学良抢前一步，抓住杨虎城的双手，使劲摇着。他的眼内噙着泪花，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经过秘密的准备和部署，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派卫队在临潼华清池拘捕了蒋介石；杨虎城在西安拘留了蒋鼎文、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3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当日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此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出现两种不同的主张：

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力主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

以何应钦等为代表的亲日派则主张讨伐张、杨，扩大内战，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

南京政府于13日成立了以何应钦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进兵潼关，轰炸西安地区。

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研究制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于12月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全国，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张、杨两将军的邀请下，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于17日赴西安谈判。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

经过一番舌战唇枪之后，24日达成了以中共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当天晚上，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条件，25日被释放。

重感情的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临行前，蒋介石也作出了承诺：（一）明令中央入潼关部队25日一律退出潼关，从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予（指蒋介石）负全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国防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我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所有被捕的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地军政概由张、杨二人负其全责。

但是，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囚禁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去职，并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出西北。

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在西安事变中不止一次地撒过弥天大谎，但他毕竟不敢完全丧失天良。

西安事变，作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停止了国共两党十年的内战，奠定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对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及所有爱国志士的赤忱襟怀，高尚人格通过这场惊天动地的事变确实是闪射出了璀璨夺目的、将会永照史册的热烈光芒！

艰苦的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至9月，根据西安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日的一系列问题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六次谈判，最终使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谈判前，作为中共代表人物的毛泽东，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以防止新的内战的爆发，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而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人物的蒋介石，耿耿于怀的仍然是想解决中共问题。在他看来早一天解决中共问题，就早一天去掉了心病。然而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让他感到，武力征服眼下不可能，那就谈一谈吧，如果能谈出使共军投降，使共产党没有地位，那一切都好办了。

2月9日，双方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和张冲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定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但同时又透露出来一股悲壮和苍凉之气。因为，此时除了妥协，则别无选择。

2月12日，周恩来和顾祝同依照以上条件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

此时，明察秋毫的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并不承认这是合作，只当做红军投降。这样下来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地位了，建议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刘伯承出面谈。

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意见仍感不满，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8团兵已在1.5万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等了三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刘伯承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聂荣臻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谈判不欢而散。

2月24日，周恩来提出的、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共产党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6万余。可见，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共又一次妥协。

蒋介石笑了。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2月26日，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周恩来谈判。在这个提议中，蒋介石把改编人数增加了一些，两师八团变成了3师9团。

这边毛泽东也笑了。蒋介石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共产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这才是最重要的。

3月4日上午，周恩来与张冲就军事问题又进行谈判。中共要求红军改编为4师12团。蒋介石不允此案，坚持3师9团。7日，毛泽东再作退让，电告周恩来：“如蒋坚持3个师，亦只得照办。”

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蒋介石审核。

至此，谈判应该说是初见效果了吧，不能，好戏还在后边呢。

蒋介石处理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后，突发奇想，对付共产党能不能也如法一试呢，遂令当年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文胆贺衷寒重新修改协议。

两日后一个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又推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后，用眼睛膘了一下张冲等人。还没等说话，张冲一看情形不对，赶忙说到：“这一案实在太不够格了，怎么变成了这样？”周恩来拿了修改案拂袖而去。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提出了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并申明西安已无可再谈，要谈就见蒋介石解决。13日，中共电告周恩来：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就在周恩来走的当天，蒋介石马上发电，请“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这次蒋要亲自出马了。

22日，周恩来和张冲同飞上海，翌日，转赴杭州，此时蒋介石就在那里。24日，蒋没空。25日，又没接到通知，周恩来不愿白坐时间了，自己约见了宋美龄，把中共所提的15条交给了这位第一夫人，并进行长谈。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了周恩来。

寒暄之后，谈话进入了正题。蒋介石慢慢地说：“过去合作的失败，双

方都要检讨，这次合作一定要保证永久性，不能只计眼前，而且要计及将来呀。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纲领，一个是领袖。你们听了我的，将如何处置你们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在以往中共所提方案中，这一问题被回避掉了。蒋介石这么一提，周恩来未有贸然答复。

3月30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杭州谈判情况。

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议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然而，中共方面几乎谁都会知道，蒋介石不会有什么诚意的。这事还是搁一搁再说吧。

4月15日，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其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

5月3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又进行了一轮谈判。结果谈判的主题没有进展，再次搁浅。

西安谈判已难以为继了。

6月8日，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了。焦点仍然是军队指挥权和人事问题。据史料记载这次周恩来是着实把蒋介石将得很为难，要不然蒋介石不会摆着校长的架子，以乞求的口气说：“恩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啊！”

接着“七·七”事变爆发了。民族矛盾成为左右中国大局的主要矛盾。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依此作为出发点。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这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坐上飞机，前往庐山去和蒋介石再一次进行谈判。

蒋介石仍然没有诚意，坚持取消中共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7月17日，蒋介石出面，双方又进行了一轮谈判，谈到日薄西山，伴着夕阳暮霜，蒋介石又回到了“只设政治机关”，负责联络的出发点上，且指名政治主任不要军人、三个师的参谋长仍由南京派员担任。周恩来等苦争无效，只好回南京静观时局变化。

中共此时态度更为坚决，他们相信时局已不容蒋介石再讨价还价了，因此电告周恩来等回延安。

随着日军暴行的扩张，蒋介石才暂时对寄希望于大国出面调停以求和平的想法产生绝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蒋介石骂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狡诈之后，还是于7月31日，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

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现在国民政府军政高级将领谈话会的会场，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公开了。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布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

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中共终于成功地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

然而，蒋介石会不会使借刀杀人之计对付八路军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清醒地知道，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在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确认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以民族大局为重，断然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同时留一个师不动，以在谈判最后阶段争取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立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首脑一定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

拒绝，不允许进入营门一步。

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战局恶化，不得不接受中共以上要求。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发表了81天前中共中央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至此，9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全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看到了希望。

何鸣事件

1937年4月，闽西南红军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国民党驻闽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以期共同抗日。

4月，闽南红军3团的代表主动与驻闽粤军157师代表在平和县西南之高坑村进行首次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

5月，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代表、红3团团团长何鸣在漳州与157师师长黄涛进行接触，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合作谈判的问题。

6月，何鸣继续与157师全权代表陈俊谈判，并于6月26日达成11项条件的政治协定。协议是谈妥了，但从里面已嗅不出太多的共产党的气息了。何鸣的一味妥协，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协议签定后，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村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对红军离开根据地集中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就有人坚持不同意离开根据地，并指出，根据地是我们红军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对敌开展斗争的重要依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等于我们投降，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己的独立性，丢掉对军队的指挥权，丢掉根据地。然而，何鸣等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于7月1日率红3团607人下山向平和县的小溪集中，改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为队长，吴金为副队长兼政训员。

不久，157师诱使该部移驻漳浦县城之孔庙。这时何鸣如能惊醒和警惕，仍可亡羊补牢，而过度轻信国民党的何鸣，毫无警惕。结果国民党以点验发饷为名，将何鸣、吴金部集中包围缴械，收缴长枪315支，短枪228支。

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同年11月向全党发出了“何鸣危险的警戒”的警告。

“七·七”事变

闻名于世的卢沟桥，坐落在北京西南15公里处。它横跨古老而神奇的永定河，是一座可以容“十骑并行”的古老石桥。它建造于12世纪90年代的金朝。意大利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由衷地赞叹“卢沟晓月”的美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29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从此，长达八年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幅波澜壮阔、气势雄伟的反法西斯民族自卫战争的历史画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且继续向南侵略，企图完全占领华北。至1935年，日军不仅侵占了河北、察哈尔省的大部

分地区，并于同年扶植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接着又在内蒙策动成立伪“汉回自治政府”。

1936年4月，在日本四相会议上竟然形成了一份这样的文件，即《华北指导方案》，扬言要“使华北地区事实上成为坚固的反共亲日亲满地带”，“并且使其有助于交通实施，一则以防备赤化势力之威胁，一则以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之基础。”在这一方案的基础上，同年8月7日，由日本首相广田主持的五相会议又通过了一个决定日本国策的文件《国策基础》。它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华北，然后与东北、内蒙等地联成一片，作为日军在中国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一侵略方针指导下，日本政府不断向华北增兵，至事发前，日本帝国主义驻扎在华北的“华北驻屯军”兵力包括1个步兵旅团及骑兵、炮兵、坦克兵约6000余人，司令部设在天津。

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除驻天津的第2大队）、电讯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第1联队第3大队驻丰台，一个小队驻通县。步兵旅团第2联队驻天津。步兵旅团其余所属各部分别驻唐山、滦县、山海关、塘沽、秦皇岛等地。此外，通县等地还有由汉奸组成的伪冀东保安队约1.7万余人，德化（今化德）、张北等地有察北伪蒙军约4万余人。

中国的兵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驻守河北省、察哈尔省及平、津的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该军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9个团）、1个骑兵师及保安部队，全军兵力约10万人，军部驻北平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师部驻北平西苑。第38师驻天津附近。第132师驻河北任邱、河间一带。第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平绥铁路沿线。骑兵师驻北平南苑和固安、易县。驻守卢沟桥的是第37师第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在七·七事变的前夕、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地区进行了频繁的军事演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中国驻军也加强了戒备。

1937年6月30日，日本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文磨组阁。3天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认为“进攻中国的机会想已成熟”。

卢沟桥的上空笼罩着浓厚的战争阴霾。

侵略者的屠刀已经出鞘了。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军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指挥下，在卢沟桥北1400米的永定河东岸龙王庙东面到大石窑村约4平方公里之地，举行所谓战斗演习。这次“演习”就在中国军队营房附近。由于这天日军演习与往日不同，因而当地驻军立即报告了旅长何基沣。何接报告后，当即向正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作了汇报。冯立即回北平与何一起布置了应战准备。

当天晚上10时30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了连续不断的枪声。这些枪声是日军自己在演习中发射的。但是，清水节郎却诡称听到了从铁路附近堤坝方面和宛平城墙方向发射的枪弹声，接着又说发现一名日本士兵去向不明。于是，清水立即派岩谷曹长去丰台军营向大队长报告。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报告后，命令该大队主力立即出动。他一面令部队紧急集合，一面打电话向驻北平城内的联队部报告。联队部同意立即出动，并令一木大队长立即前往现场部署战斗。这时，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

也电告冀察外交委员会声称“失落日军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日兵”。冀察外交委将松井电话内容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请示如何处理。秦立即答复：“因为日军的演习未经许可，士兵下落不明本当局不负责任，如果是事实的话，由当局的警察搜索。”一会儿，松井又电告冀察外交委，如中国不允许，日本方面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即指示驻宛平部队和河北省第3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王随即通知城内驻军第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经查，我军既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所谓日军失踪的踪迹。王将清查结果向市府报告后，奉市府之命前往日本特务机关与松井谈判。谈判决定，由中日双方各派3人进行调查。中方为王冷斋专员等3人，日方为樱井顾问等3人。

8日凌晨3时，调查人员到日军第一联队部。牟田口联队长蛮横不讲理一再纠缠，遭到王冷斋的坚决拒绝。调查人员随即前往宛平城。调查人员由联队部出发后，牟田口派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前往卢沟桥地区指挥战斗。

凌晨4时，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向联队长报告，诬蔑“中国军队再一次向我军射击”，牟田口联队长回答说：“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就予以回击！”5时，一木下令所属部队由铁路北侧地区向宛平城外的中国驻军阵地进攻，同时令位于沙岗村北侧小土山的炮兵支援步兵作战。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吉星文第219团（吉星文团长当时在江西庐山受训）第3营营长金振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抵抗。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令守军：“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不准日本的一兵一卒进入，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和宛平城是我军最光荣最重要的基地，要与城池共存亡。”前线守军士兵极为激昂，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卢沟桥为吾人之坟墓。”

日军炮击宛平城，专员公署和房屋大部被毁，人员也有伤亡。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左右，日军攻占了龙王庙及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在战斗中，双方都有严重伤亡。守军营长金振中及保安大队副孙境武虽负伤，但仍不下火线，带领士兵坚守卢沟桥阵地。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8日晨，日本外务省召开紧急会议，下午，日本内阁也召开会议，两个会议的研究之后，遂抛出了一个烟幕弹，定调为“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并向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各派出机关发出了训令。日本参谋本部为了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伪满的建设和对苏战备，于下午6时42分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发出训令：“为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个信条，叫做“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回”。

就在研究“事件不扩大”的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于8日派两名参谋到北平联络，今天津各部队于8日3时作好出动准备，同时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旅团长立即返回北平。8日4时20分，向东京陆军军部发电报告。8日9时，下达如下命令：一、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谋求事件的解决。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并令天津各部于中午由天津出发。8日下午3时，牟田口联队长亲自到卢沟桥前线指挥，准备9日拂晓攻击宛平城。

9日凌晨2时，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与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已达成三点停战协议，但战斗仍未停止。6时左右，日军又向宛平城内发炮弹70余发，中国守军被迫向日军进行还击，战斗至7时30分方止。这一天，按停战协定从冀北来宛平接防的300名中国保安队员，在途中也遭

日军袭击。当天晚上，日军继续袭击宛平城。

10日晚上9时15分，因白天中日双方谈判无进展，于是日军再次实施军事压力，以1个大队的兵力向卢沟桥前线中国守军发动夜袭。

11日凌晨1时，中国守军第3营向日军反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反复进退达十多次，终将失地收回。金振中营长负重伤，送保定医院治疗。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时，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政府的主要官员正在江西庐山开会。

7月9日，蒋介石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狡诈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7月10日，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回到南京，向日驻华大使提出书面抗议，要求：“（一）将肇事的日本军立即撤回原驻地，等待合法解决；（二）外交部对此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对此，日方无理回答：“（一）根据条约规定我军有在华北驻屯和演习的权利；（二）此次事件系中国引起的，我方在不得已之下采取了自卫措施；（三）事件发生在中国方面；（四）外交部来文所提之保留不能承认。”

7月11日，日内阁会议通过了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上述派兵和改名，均报天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向全世界发表。这一声明实际上是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宣言。下午6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命令，令关东军将所辖独立混成第1旅团，第11旅团主力，空军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 and 电讯、汽车等部队各一部派遣去华北。7时30分，参谋总长又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迅速率部到达华北，归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当天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代表开会，阐明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海军及航空兵部队都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关东军和驻朝鲜军接到参谋总长的命令后，立即动员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

1937年7月11日下午9时，何应钦在南京召开了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部队调动、高射炮部队的编成和弹药、粮秣的准备与储运问题。

7月12日，蒋介石令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同时，蒋介石令孙连仲所部和庞炳勋的部队集中在保定，准备在永定河沧县至保定一线作战。当天下午7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发布了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两铁路沿线集结。同时，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线北线防区的防卫任务，负责平汉、陇海、津浦铁路集结军用车辆。当晚9时，何应钦召开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令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宣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其大意是，如宋哲元因环境所迫要求忍耐以求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日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需作全盘的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如第29军需要子弹和军需，中央可以源源补充。

7月13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并要他移住保定，免受日本人包围和压迫。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真是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意，为了保存其实力

一味退让、妥协。

11日，他从休假的山东乐陵回到天津。第二天（即12日）他违背蒋介石前两天给他的电令精神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之大幸……”这天何应钦在南京打电话告诉他：接到中国驻日大使的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何应钦要宋速回北平准备作战。宋在天津的一些亲日派、汉奸恫吓和利诱下，竟决定对日妥协。

宋哲元为了讨好刚上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13日夜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

14日夜，宋哲元派张自忠、刘燮元、陈觉生为代表与日军参谋长谈判。谈判结果是：（一）处罚卢沟桥事变时的中方营长；（二）日方提出宋哲元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道歉；（三）北平的城防由张自忠的第38师担任；（四）立即实行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

17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按照陆军部的旨意，和张自忠进行谈判。张答复：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两三日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直属部队驻扎。

18日下午1时，宋哲元偕张自忠向香月道歉，以尽力挽救冀察平津第29军来之不易的地盘。宋哲元19日回北平后，立即命令将城内各要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一律拆除；并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还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宋哲元完全答复日方的无理要求后，天津地区的局势在表面上似乎有所缓和。但他没有看到这是日方缓兵之计的假象。

20日下午，蒋介石从庐山回到了南京。这时，宋哲元才将与日军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正式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23日，蒋介石电复宋哲元：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如已签字，中央愿予以批准，表示共同负责；如尚未签字，中央有两点意见补充，第37师撤离宛平县应为暂时性的，对于排日团体的取缔应由中国自行决定。蒋介石对宋的答复，事实上已批准了已达成的协议。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但这些都皆成为泡影。此时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唯一出路，就只有横下一条心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实行坚决抵抗了。

这时，可怜的29军以一副军长、一师长和众兄弟的生命，才换来了宋哲元的一点醒悟。

然而，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同日，毛泽东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力，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知道宋哲元等有与日军妥协趋向的消息后，于7月25日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对卢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

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件！”“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宣布的‘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大家紧密的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影响和中国红军请缨出征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呼吁下，中国政府才决心对日作战。

日本侵华的野心虎视眈眈。

中国抗战的决心已定。

于是，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已迫在眉睫，决斗的剑已出鞘，已不得不战。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24日，日本统治集团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定了进一步征服中国的作战计划，批令华中方面军，利用在上海周围取得的战果，及时进行果断追击，扫灭上海附近，断绝该地与南京的联系，使南京成为孤立之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深须天皇之意图，他认为不能仅限于孤立南京，必须且可能追击到南京，就这样这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祸首率着一支凶恶的部队，对于英勇反抗侵略者的中国军民，举起屠刀，杀气腾腾地一路杀来。

侵华日军溯江而上，先后占领了常熟、苏州、嘉兴、芜湖、镇江等地，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焦土，凄凉和恐怖笼罩着这片江南鱼米之乡。

此时国民党军、国民政府、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他们又在干什么呢？当20万日军分6路向南京逼进时，国民政府却宣布：“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将移驻重庆。”蒋介石于12月5日离开南京，但他临走前没忘了还下了条命令，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负责南京的守卫任务。

唐生智对这一任命，真不知是重用还是替罪羊。考虑来考虑去总觉得还是被重用了吧。于是向新闻界发表了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要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12月上旬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第8号命令，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取敌国首都南京。”在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下，日军以大炮和飞机对南京城实施狂轰猛炸，南京城内屋倒房塌，一片火海，死伤无数。

滚滚长江水，千百年来流经这里，溯江而上达武汉三镇，顺流而下至港口上海，江涛翻滚，奔向大海。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曾因长江为屏障而固若金汤。但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用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日本侵略军，却暴露出易受腹背攻击而不易防守的缺陷。而更大的缺陷是国民党最高决策者在这里军事布防上的失策，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至12月10日，日军全面攻击南京，12日，日本军舰到达下关，封锁江面，南京城已处四面包围之中，危在旦夕。

在侵华日军对南京发动总攻击开始后，已到重庆的蒋介石，也不知是基

于把这个乱摊子留给唐生智的愧意，还是基于对他的爱将及 10 万大军的心疼，遂发来一道电令：“如情况不能持久，可相机撤退。”蒋先生此时不知想了没有？军队可以撤，南京市的居民能撤吗，撤向何方？

12 月 12 日唐生智仓促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撤退。当日他本人在 78 军军长宋希濂部掩护下，在下关渡江，到达浦口，丢下十几万军队，自己逃生去了，昔日信誓旦旦的决心，早已抛至九霄云外。

由于事先没有做出撤退的周密计划，各部队撤退时，全都蜂拥至江边，混乱惊慌、狼狈到了极点。13 日，日军已到下关八挂洲江面，向江中的国民党官兵扫射，死伤无数。日本随军记者石川达三对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败兵们把方桌、门板、圆木等一切可以浮起来的東西弄来，渡过宽阔的长江，向对岸浦口逃去，败兵的人数约有 5 万，江面上黑压压的，可是当他们渡过对岸时，日本军早已迂回到这儿等着他们。机枪响了，子弹像雨点似地落在水面上，他们想回头跑，下关码头已被日军占领，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最后，我海军驱逐舰一举消灭了这些漂流在长江上的败兵。”十几万守卫南京的中国官兵，就这样，除少数渡江逃险外，其余或战死，或淹死，或放下武器。至此，所谓的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指挥的无能、抵抗的无力，致使南京沦陷，日军大规模的屠杀暴行便开始了。

13 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拉开了大屠杀的帷幕。次日，其他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南京的南北各市区，展开大规模的屠杀。

13 日，约 10 万名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在燕子矶被日军围在沙滩上，用数十挺机枪持续扫射，尸体蔽江，至少有 5 万余人被杀害。

14 日，日军在汉口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 7000 余人。

15 日夜，9000 余人被日军押往鱼雷营江边集体屠杀，只有 9 人逃生。

16 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中山码头、彭楼四条巷一带屠杀数万人。

17 日，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屠杀 3000 余人，在三叉河屠杀四五百人。

18 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将 57400 余人集体屠杀，“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戮，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于江中”。

从 13 日下午起，日军在紫金山活埋难民 3000 余人，在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 20000 余人，在上新河一带屠杀中国被俘军人、难民 2873 人。

据《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日军无数暴行。”“从光华门北上，走向中山东路，在光华门马路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马路中间横倒的许多木柱子的下面，压着的都是发尸体，四肢断折飞散，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我还看到战车毫不留情地在尸体上碾过，听到车底履带辗转过过去的声音，闻到尸臭和硝烟气味，感到简直堕入了刀山、油锅、血污池的十八层地狱。当时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就是地狱里面目狰狞的狱卒了。”“12 月 13 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凄惨的大屠杀。俘虏们在 25 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腹部刺去，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寒毛直竖，浑身战栗。……我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可是，在那残暴的场面中，却出现了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令人永难忘记，那就是俘虏们在被刺杀时的态度和表情。

他们站在死神面前，有人脸上浮泛着冷笑，有人若无其事地大笑，等待着死亡。”

《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写道：“我于12月15日夜，在江浦《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被赶到下关屠场。我跟随到那里，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目击了这样一幕大屠杀的悲惨情景。在码头上，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人影，总有50人乃至100人以上，转来转去拖曳着尸体——微弱的呻吟、滴沥着鲜血、抽搐着手脚——丢向江流里去。他们不声不响地忙个不停，就像在演哑剧。在朦胧中渐渐可以看到长江的对岸，码头上到处都像月夜泥泞一般，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啊，那是血渊！过了一会儿，作业完毕，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只见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腾空跃起。——都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据在场作业的一个日本军官说：当时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人。”

另一名日本记者佐佐木元胜在《野战邮局》中写道：“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几条土路之间，似乎还留着惨叫呼救的光景”，“江岸的道路、岸壁和水滩上，败兵的尸体叠成几重”。“我曾在东京大地震时目睹尸体重叠的惨状，可是跟这个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丧生于枪弹、刀剑之下者恐怖异常，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被淋上汽油被烧成焦炭。尸体之旁是运来庆祝胜利的酒桶，堆积如山，上面有兵士在放哨。战胜国与亡国之间，竟有这样严酷对照的场面。”

指挥日军进行大屠杀的谷寿夫，在攻占南京的“军状报告”中还恬不知耻地写下了“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他竟能引以为荣。

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后，至少有6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屠杀。中国军民有19万余人遭日军凶残的集体屠杀。

千年古都，遭到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劫难，南京已成为残垣断壁，尸横遍野的人间活地狱，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侵华日军兽性的恶性发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这次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屠杀规模之大，杀人手段之狠毒，受害人之多，迄今罕见。在现今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各种字典里，都难以找出一个恰当的词汇，能概括地勾画出侵华日军的暴行。

当一批批中国军民被驱至屠杀场所，被集体屠杀时，在南京城内外，分散屠杀无辜也在疯狂地进行着。日军三五成伙、八九成群，见民宅就进、见人就杀，暴虐成性的日军几乎以虐杀为乐事，以奸淫为快活，其屠杀手段花样翻新，极端野蛮残酷，有枪杀、刺杀、烧死、刀劈、活埋、挖心、分尸、用军犬撕咬、剖腹取胎、割生殖器、先奸后杀等等，惨不忍睹，令人发指。

期间，在日军中出现了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

日军第16师团两名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岸，12月初在随军侵入江苏句容县时，就已约定“举行单项刺刀友谊比赛，看谁能在完全占领南京之前，首先用军刀杀死100名中国人”。很快向井杀了89人，野田杀了78人。几天后，日本随军记者报道：

12月10日，两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道：“我杀了105人，你的成绩呢？”向井答：“我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同时大笑，哈哈，向井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确定不了是谁

先达到 100 之数的。因此，他们两人决定这次不分胜负，重新再赌看谁先杀满 150 名中国人！12 月 11 日起，”比赛又在进行中。

两个人还分别执刀，拍照合影，上面写了“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字样。东京《日日新闻》刊载了这“斩杀百人”的报道。日本人一时“万口争传，誉为勇壮”。

而谷寿夫师团的一个中队队长田中军吉，在南京西南郊一带，用一把“助广”军刀，砍杀俘虏及平民 300 余人，并拍了挥刀杀人的照片。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编的《皇兵》一书中，在照片旁写着“曾杀 300 人之队长爱刀助广”

日军进入南京后，兽性大发，四处强奸，惨无人道，往往是奸杀并行，其凶残令人发指，其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 12 月 13 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 5 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九月之孕妇肖余氏，16 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 63 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少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 13 人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 13 至 17 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于轮奸少女后，复令过路和尚与之行奸，和尚拒而不从，口中念着“阿弥陀佛”。日军见了拍掌大笑，当即割掉和尚的生殖器，和尚疼痛致死。

对于日军的淫暴行为，在南京的外国人深感震惊。一位外国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可怕而痛苦的情形，简直使你难以想象。金陵大学校内被强奸者中，有年尚 11 岁的幼女，也有年逾半百的老妪。在其他的难民群中，甚至 72 岁和 76 岁的老太太也被惨无人道地奸污了。在神学院内，17 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一个妇女。事实上，有 1/3 以上的强奸案是在白昼发生的。”而最常见的手段是轮奸，年幼少女往往被轮奸致死。更为残暴的是，日军奸后把被奸妇女杀死，赤裸裸地躺在大街上，有的被害妇女仰卧地上，小衣撕破，下身肿烂，有的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有的妇女被奸之后，被割去乳房，日军又用大棍由下部捅向腹部致死。一位目击者回忆，日军“有的用刺刀戳穿下部，摔死路旁，让她惨痛呼叫，有的用木棍、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军则在旁拍手大笑”。一个曾参加血洗南京的一等兵田所耕三讲：“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20 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可以说，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不强奸妇女的日军士兵，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强奸，若没有上司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日军中将谷寿夫，不但亲自持刀杀人，还亲自在大街上强奸妇女。据查到的证据，被他奸污的妇女有 10 余人。

按主持难民区调查的国际人士的粗略估计，南京城被日军奸污的妇女，达 8 万人之多，而且大部分被奸污之后，又遭受杀害。

在南京目睹日军暴行的一位外国人说：“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象的坏事情，日军进城以后，都毫无顾忌、毫无节制地一一实行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德国驻南京的外交代表在给德国政府的一份电报中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这是整个（日本）陆军本身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

日军在南京内外分散大屠杀，使 15 万余南京市民遇难。

进入南京的日军部队，最初 6 周的大规模屠杀、奸淫、烧抢等暴行，世界各国均有报道，并遭到国际社会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但日军当局我行我素，屠杀几乎持续了三个月。计有 34 万中国军民惨遭杀害。

侵华日军为掩盖大屠杀的罪证，在血腥屠杀的同时，就在进行着销尸灭迹的活动。然而销尸的速度却远没有这帮疯狂的兽类集团屠杀的快。仅收埋尸体的工作至到第二年的 5 月才告结束。由此可见日军之残暴。

尸体可销毁，但日军犯下大屠杀的罪行却不会通过销焚尸体而消失。滚滚东流长江水，卷走了成千上万个残骸冤骨，但洗不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大屠杀的罪行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日本侵略者在人类文明史上犯下了最为可耻的罪行。

历史对任何人任何民族都是公正的。日本军队的侵略、暴行、奸淫、掠抢注定了必将要受到正义的审判。

二战结束之后，南京大屠杀之罪魁松井石根和武藤章受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刑架。南京大屠杀另一罪犯谷寿夫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野田岸以及杀了 300 人的田中军吉，经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也受到了正义的惩罚，处以死刑，枪决于雨花台。

花园口决堤事件

花园口是黄河下流的一个渡口。自古以来，黄河和淮河就是中国最有名的灾难之河。从公元 12 世纪到 1855 年，黄河夺淮长达 700 年之久，泗水及淮河下游入海河道全部被淤废，淮河干流中游及淮北、鲁西南等广阔平原的排水河道，也因黄河长期泛滥而严重淤塞，全流域水系紊乱，上中游洪水难排，下游入海无路，入江不畅，水旱灾害连年不断。1400—1900 年的 500 年间，淮海流域就发生较大水灾 350 次。

然而进入近代发生最大的一次灾难，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人为制造的一场灾难。

1938 年 5 月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在豫东皖北收拢兵力，6 月 6 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河南省省会开封城，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节节后退，着实让蒋介石大伤脑筋。

打不过，战还败，怎么办？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蒋介石计上心头，日军不是占领了开封吗，我让你再往前追吧，老子就炸开黄河。老百姓？老百姓算什么，只要能挡住日军，就是我蒋介石的胜利。

结果，中国军事统帅机关不仅不去组织军队和人民进行有力的抵抗，却决定在郑州以北郑县的花园口一带放水拒敌，引黄河水南流，想把日本侵略军挡在郑州以东，以阻止其前进。

主意已定，立刻下令。

1938 年 6 月 9 日，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的命令下来了。国民党军在 20 军司令商震的指挥下，于郑州以北 24 公里的花园口黄河南大堤实施爆破决堤。汹涌的黄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崖四个村庄瞬间被冲得踪影全无，口门处冲刷成 13 米深、170 余公顷的深潭。洪水沿贾鲁河、颍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漫卷，由十几里扩展到 100 多里宽，在人烟稠密的大平原上横冲直撞，而后在正阳关至怀远段涌入淮河。黄水入

淮后，又溢出两岸，继续泛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

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房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花园口下的中牟首当其冲，全县 2/3 陆沉。幸存之难民扶老携幼，纷纷西逃，郑州附近，集难民数千，食住皆无，情景堪怜。县西北十余里的沙窝地方，聚有难民 3000 余人，十数日来，树皮草根已食之将罄，幸派出三人求救，否则再有二三日，恐全部饿毙矣。

黄河决口，据说将日军的约一个半师团陷在了泛区，暂时阻止了日军西攻郑州，并将武汉的沦陷时间至多推迟了一两个月。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委员长笑了吗？他是不是在庆幸和欣赏着自己的高明。

花园口决堤，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为巨大的悲惨代价。

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计有河南、安徽、江苏三省 44 个县、市受灾，3911345 人外逃，893303 人死亡，经济损失达 109176 万元。

另据报道，总计受灾人口超过 6000 万。

更为悲惨的是自 1938 年开始的 9 年黄泛，更使淮河水系彻底乱套，这一地区于是年年闹灾，再无宁日，民生更加悲惨。黄泛 9 年，黄水把上百亿吨泥沙扔在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厚厚的黄沙埋没了田园村舍，淤塞了湖泊河道。大地上，沙丘起伏，野草丛生，天空中，黄沙飞扬，蝗虫蔽日。这片原本富饶的土地，变得百孔千疮，民不聊生。

现代汉语中从此就有了这么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

汪精卫叛逃投日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压境的形势面前，汪精卫已在重庆坐不下去了，他决定叛逃投日。

1938 年 10 月 22 日，他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等人密商对日投降条件与办法。汪、周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上海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

时任国民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主编过《国际丛书》，颇费心思研究过日本现状。但梅的仕途却不甚得意。虽然是 CC 系骨干人物，可战前仅仅当过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专员等小小芝麻官。战争中他不甘寂寞，投入汪氏怀抱，成为“和平运动”干将，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汪精卫、周佛海交给他的与日本谈判的走狗任务。真是无独有偶，乐当走狗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他从小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人称“日本通”。30 年代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任教，发表过一些有关中日外交的论文，深受汪精卫赏识，邀他至外交部，任科长、代理司长等职。1934 年高宗武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和“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认为是“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因此官运亨通。卢沟桥事变后，高宗武为蒋、汪奔走，极力为促成中日“和谈”效劳。

授领了任务的两名走狗，开始了奔走游说。11月12日至14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5日，今井武夫离上海回国，送交谈判所达成协定草案。16日，汪精卫会见蒋介石，想逼蒋介石辞职。18日，今井武夫由日本到上海后，继续与高、梅谈判。20日，在上海重光堂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这就是汪精卫叛逃前最初的卖身契“重光堂密约”，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投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伺机叛逃的汪精卫，原计划12月8日离开重庆，但那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来到重庆，汪因碍于蒋介石在重庆，迟迟不便脱身。一直到12月18日，谎说要去成都作一次演说，然后匆匆赶到机场，带着妻子陈璧君，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随从秘书长曾仲鸣夫妇及女婿何文杰乘机飞往昆明。次日，汪精卫等人由昆明逃往越南河内。汪精卫在离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一日，再行返渝。”21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逃往河内。

1938年12月22日晚上东京时间8点20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10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患，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的第三次对华声明。

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意见激烈斗争，互相折衷的结果。日本统治集团有“不扩大派”，他们已悟出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可征服的，仅靠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引诱汪精卫等人逃离中国抗日阵营。当他们一接到汪出逃的消息后，就力促日本政府尽快发表声明，主张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另一派是“强硬路线派”，他们特别反对“重光堂密约”中规定的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期限。对重光堂协议不满意。

重光堂协议，本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条款并不满足，当时不过考虑了汪精卫集团所能接受的程度，并把它作为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饵，所以才写入汪提出的一些条件。实际上，“重光堂密约”后的10天，即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了《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其中对中国的权益的要求，远比重光堂协议广泛、苛刻得多。而近卫声明，则是表面上遵循重光堂协议，骨子里贯彻《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精神，是后者一份措辞含混的外交版而已。

而此时的汪精卫则再明白不过了，刀柄在人家手里，一切条件都得接受。

近卫声明发表后，重庆大哗。蒋介石集团群起而攻之。24日，蒋介石要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说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而且准备作大规模抵抗。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对汪精卫叛逃发表讲话，他说：“汪精卫此次赴滇途中，忽又发现心脏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遂赴河内治疗。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不必相信。”

但是，此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汪精卫，死不回头。29日他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29日的申报代日韵母是“艳”字，故称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30日，他又向日本提出4点希望；（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之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争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

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300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文化事业费中开支。（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这些希望的核心，就是希望日军加重军事压力，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以便让汪精卫上台“收拾时局”，当儿皇帝。“艳电”发表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国民党于1939年1月，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

此时的蒋介石也许是从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着想，也许是念了一点感情的成份。曾派人去河内，送去护照和巨款，要汪去欧洲“疗养”。汪不从命，执意投日叛国。

敬酒不吃，看来是要吃罚酒了。汪精卫不接受蒋介石的好意，着实让蒋介石很不高兴了一阵日子，随将此事交给了心腹戴笠去处理。

1939年1月，戴笠命令潜入河内的军统特务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翹3人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任组长，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3月21日晚上11时40分，王鲁翹、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6人驾车趁着夜色前往高朗街27号汪宅，劈门冲入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开枪射击，却不料汪氏夫妇住在隔壁，曾仲鸣夫妇睡在汪的卧室，曾仲鸣“被击中数10枪，其夫人亦中3枪”，曾仲鸣被送往医院几小时后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其妻重伤。从此，汪精卫在河内成天提心吊胆，急于投入日本怀抱。

在此之前的2月21日，汪曾派高宗武抵东京，向日本政府送交他们提出的关于成立新“国民政府”，实现中日和平的方案。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日本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22日，亦即汪宅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派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至安全地点。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到上海。一个月之后又乘日本军用飞机由上海抵东京。

到东京后，汪精卫即成立“政府”问题，与日本当局谈判。6月16日，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5项决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旗帜的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汪不同意，最后日方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在“国旗”的上方加上写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于重庆用的国旗。汪精卫居然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后来汪伪政权的“国旗”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飘带的“辫子”，上面书写“和平反共建国”6字。

至此，汪精卫已完成了他的叛逃计划，投入日本怀抱，从此开始了走狗的乞求政治生涯。

对于他的“国旗”世人曾咒之：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延安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是全国范围的，在陕甘宁边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党在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都进行了整风学习。这次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而又以延安的整风运动最为典型，所以一般通称为“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从准备时期算起，是从 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告一段落。但是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学习，是从 1942 年 2 月到 1943 年 10 月，通常所说的 1942 年的整风运动，就是指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

1938 年 9 月，我们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就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根本条件：党中央的领导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全会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六届六中全会是延安整风运动准备时期的开始。

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全党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和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党的建设基本原则上分清了是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团结全党，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了加强学习，193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洛甫）同志任部长，李维汉（罗迈）同志任副部长，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是和检查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的。在学习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加强对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

期间毛泽东感到，在党的干部中，对于王明“左”倾错误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对于党的历史经验，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对于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党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路线问题，进行认真地学习。

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了半年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随后在 1942 年 10 月又编印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 120 多人，核心有 40 多人。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

学习进行了四个月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问题。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和“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方针的指引下，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了党的历史文献，进行了多次讨论，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个基础上，1941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及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

从政治上、思想上来说，1941年4月，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6月，《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编好了这本书。7月，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1月，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12月，中央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这些文件和著作陆续发表以后，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从9月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社论，引导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些指示。

在组织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1941年9月26日，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点，都成立高级学习组。中央把相当一批高级领导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为了使中央党校能够担负起整风学习的重任，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改组了党校，坚决纠正党校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贯彻整风精神。中央对于加强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各团体，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制定了贯彻中央决定的具体计划和措施。

在一般干部中，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有关整风的文件。他们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广大干部迫切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普遍的整风学习，进行一次思想大革命。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

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

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由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发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是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中央规定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学习和检查。普遍整风时期大体上分为五个阶段，逐步进行。从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共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

从2月1日到4月2日这两个月的时间，是普遍发动阶段。

在这个阶段，各单位普遍地向党员和干部作了思想动员。2月28日，中央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了贯彻党的整风精神，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经过两个月的普遍发动，中央研究了各单位的整风学习情况，总结了各单位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对于整风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于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规定。这个决定是中央指导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

“四三”决定发布以后，延安整风运动就转入学风学习阶段。整顿学风的学习，共进行了四个月，到8月初告一段落。

学风学习阶段，着重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这个讲话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另一场大辩论。

8月初，各单位相继转入党风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共四个多月时间，至12月中旬结束。

党风学习阶段，着重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党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解决组织路线，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所以，在党风学习阶段，中央更强调了反省自己，更强调了学和用的统一。广大干部在党风学习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贯彻执行。

在党风学习阶段，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搜集和整理历史和现状的材料，为大会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十余万字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最迫切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而且给全体同志一个研究任何现实问题的方法上的榜样。毛泽东同志还为大会作了论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报告。刘少奇、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在会上都发表了演说。

这次长达88天的会议是一次真正的整风会议。

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共三个月，至1943年3月中旬结束。

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在文风学习阶段，各单位和每个同志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检查了写文章、作决议、作报告的党八股作风，特别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的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

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机关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延安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转入最后一个阶段，即总结阶段。

6月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这个文件，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基本结束。

此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高峰。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

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时期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真正作到了从路线问题入手，经过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又回到路线问题上来。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全党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固的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党的各项政策都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比过去更加巩固并且有了更大的发展，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又再一次上升。

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在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以后，在党的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继续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把这样的方针，当时概括成为“团结—弄清—团结”，后来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延安整风运动的这三个时期。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准备时期，没有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取得思想一致，就不能有党的坚强的领导，从而也不可能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如果没有在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形而上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能彻底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不能从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上彻底清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普遍整风之后，如果不进一步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讨论党的历史经验，并作出结论，那么，仍然达不到全党团结的目的，也不可能对中国革命起这样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最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学习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全国人民都有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通过总结整风运动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建党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国共合作刚过一年多时间，国民党即已无心抗日，把眼光死死盯在了敌后艰苦抗战并得到了逐步发展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坚持对敌斗争，不但有力地消灭了敌人，而且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然而，国民党却处处为难，到处使绊，不断挑衅和制造磨擦事件。

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针对这一情况，1938年底中共方面曾让到西安参加高级将领会议的彭德怀，面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要求：“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并指出“华北各区重新划分时，应不照过去省界，而以游击战之形势决定。”

这本是为着抗日，为着便于军事指挥的好主意，而蒋介石却听不进去，他不但不听也不见。

彭德怀从西安追到重庆，最后蒋介石发话了：“调查后再议。”

蒋介石开始想对策了。共产党的要求让他有两个晚上没睡踏实。八路军遍地开花，将来就会遍地结果，这还得了！共产党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不是要变颜色了吗？苦想之后，他向各战区下了命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命令下去了，又觉得不够具体，于是再令增兵可北和山东。

上梁不正，下梁歪。

蒋介石手下确实也不乏有得力干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初，在山东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宁匪化，勿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口号。沈鸿烈更规定了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人员“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三条办法，加紧进行袭击八路军，暗杀共产党员和摧毁抗日政权的反共磨擦活动。

4月30日，沈鸿烈指使国民党复兴社骨干、泰安专员、别动队司令秦启荣，率部突然袭击驻博山（今属淄博市）泰和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游击支队，在八路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大举进攻残杀八路军团政治部主任鲍潭和营长吕乙亭以下400余人。

从此在中国史书辞条中又多了一个博山惨案，这就是这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沈鸿烈一手策划和导演的。

事后，沈鸿烈还派人专程到重庆去报功请赏了。

平江惨案

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内部投降空气日浓，反共逆流高涨。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献媚，做好投降准备，国民党更加积极镇压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的抗日运动。1939年2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同年6月又继续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6月11日，发生了深县事件；12日又发生平江惨案。

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新四军通讯处，当场枪杀了新四军高级参议涂正坤和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当晚，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

书吴渊、少尉军需吴贺泉、妇女干事赵录莹残酷屠杀活埋。通讯处的物件也被抢掠一空，计有：驳壳枪6支，步枪2支，手枪2支，纸币5000元，以及新四军的符号、军用证明书、公文信件、密码等。造成了震动全国的反革命屠杀案。

新四军的湖南平江通讯处，设在平江以东60里的嘉义岭。这是个有几百家店铺的市镇，三面环山，一面靠水，通讯处就在市镇中的一幢房子里。

这个通讯处，是湘、鄂、赣工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在革命根据地留下的。当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对党和红军有深厚的感情，觉悟是比较高的。通讯处在那里领导抗日运动，安置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帮助革命军人家属就业生产。老百姓对通讯处的成员，亲如家人。

1939年初，日军已快打到平江，国民党地方政府准备逃跑，乘机大发国难财，各种冠以“救国”二字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秩序极其糟糕。这时，国民党第20集团军杨森部从四川开到了平江，说是要抵抗日本。不久，便来到了嘉义岭镇。

为了团结抗日，通讯处曾发动群众去欢迎他们。可这些国民党官兵，对群众的欢迎和抗日热情傲然不理，并且是横行霸道，欺负百姓，他们买东西下给钱，乱叫老百姓腾房子，苛捐杂税，除原有的项目之外，更增加了什么“抗日”劳军费，军粮马粮，全出自当地老百姓身上，而且还要上等谷子。小小的镇子顿时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老百姓常说：“我们自己的部队要在就好了，不会遭这么大的难。真是‘前门有虎，后门进狼’啊！”他们都纷纷到通讯处来，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他们述说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罪行，迫切地要求起来打日本、反抗国民党军队。

涂正坤同志为了顾全大局，总是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要耐心争取他们抗日，万一寇占平江，共产党一定和平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涂正坤同志是个优秀的革命老战士，待人诚恳，非常关心群众疾苦，在当地威信很高。

一天，国民党平江县长向通讯处的负责人说：“你处工作人员大肆活动，不守法令，已引起地方人士之不满，这样下去，你们对后果要负全部责任。”通讯处的同志们，当即严词驳斥了这种谬论，质问他是什么样的“法令”与“活动”，是抗日的吗，还是反抗日的，如是前者，我们堪称模范。并正告所谓地方人士，他们所谓“不满”是企图侵犯我们抗日的职责与权利，那末，破坏团结抗战的后果，要由他们全部负责。此后，反动派便大张告示，说什么“近有奸人匪佞，假借抗日救国，乘机煽惑愚民，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屠杀借口。

1939年6月12日的午饭后，天气闷热，通讯处的办公室里，涂正坤与罗梓铭二同志，正低声商讨问题。由于时局紧张，抗日工作繁忙，他们已三四天没有好好地休息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个国民党军的副官，嘻皮笑脸地拿出公文要请涂书记到国民党部队去一趟，说是有要事相商。涂书记出了通讯处，走到一片田野里，一阵乱枪，将涂书记打死。

之后，一群恶狼似的国民党兵，冲进了通讯处的房子，大喊：“不许动，搜查！”将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捆起来。接着便翻箱倒柜，一味蛮干起来。

住在外面的女共产党员徐敏，正要冲过去，被房东显老一把拖住，推进了自己的房间。这房东显老，为人耿直，对通讯处的人员如待子女一样。当

下显老挺身掩护，在敌人搜查时，一口咬定，徐敏是自己的儿媳妇，才使徐敏免遭遇难。

天黑之后，徐敏在群众的帮助下，逃出小镇与区委取得了联系，当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一个个都握紧拳头，要找反动派算帐。但他们才3支短枪、几个人，去和敌人拚了也无济于事，只能抑制了感情，冷静地商量对策。决定赶快通知其他同志做准备，给反共分子以有力的回击。

商量完后，已过半夜，同志们都要各自走了，徐敏请求留下观察动静。

天黑如漆，镇上的手电筒光，闪闪悠悠，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还在继续搜索着……不一会儿，突然传来一阵“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呼声。这是罗梓铭同志喊的，接着，赵录莹同志唱起了激昂的歌：“……不打老百姓，不杀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山下的枪声响起来！万恶的匪徒，竟在黑夜庇护下枪杀最优秀的抗日志士！

第二天，镇上传开了敌人的罪行：晚上在山沟里杀了罗梓铭与赵录莹同志，后来，又用毛巾塞住曾金声、吴贺泉同志的嘴巴，把他俩活埋了。

此后，反动派便在当地屠杀革命群众、地方工作同志、伤病员与革命军人家属。其中还有共青团县委书记张德华等。

为了把反动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公诸于世，未遭毒害的共产党人，立即印发了“快邮代电”，把消息散布到全国各地。

平江惨案的发生，在全国激起公愤。新四军领导人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调查事件经过，严惩杀人祸首。8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演，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严厉制裁汉奸和反共顽固派。

深县惨案

根据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国民党要在华北成立冀察战区，在冯玉祥的多方努力下，12月4日，蒋介石将对任军法执行总监的鹿钟麟升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作为蒋介石的宿敌冯玉祥的亲信，自然无法指望捞到大后方的什么肥缺，蒋介石能把他放在河北这也算是不错的了。而在蒋介石来说，和冯玉祥打归打，毕竟还是兄弟一场，就顺手给个面子吧，再说把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鹿钟麟放在河北，实在有点将他放在火炉上烤的味道。

鹿钟麟到河北踩了踩地皮，马上觉得这个省主席不好当，孤悬敌后不说，除了日军和八路军外，部队都是杂牌，根本无力统一河北的党务、军务。政务呢？显然是更难办了，共产党在这里已经扎下了根，部分地区已成立了政权，鹿钟麟试着派人到八路军占领区去了几趟，碰到几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思前想后，着实让鹿钟麟食量大减。

然而，鹿钟麟哪里是等闲之辈，两个月后，他就理顺了河北国民党各色武装的关系，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的帮助下，他觉得这个主席当的有点滋味了。

接下来，便开始琢磨共产党了，总得设法向共产党讨个说法。国共双方在河北的控制区犬牙交错，鹿钟麟深感难以驾驭，几个月下来，矛盾重重，

已经是结连结，捆成捆了。

双方都有部队，一不留神，枪就会响的。

鹿钟麟自然知道，共产党不是好惹的，但不把共产党赶走，他这父母官也当不好，坐不稳。于是经过苦心冥想，主意有了。

遂向重庆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之八路军主力 129 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其所编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政府指挥。矛盾上交了，看你委员长怎么处置。

1939 年 2 月，鹿钟麟从重庆回到河北后，腰杆挺直了许多，也许是得了委员长的鼓励或者是面授了锦囊妙计，也许是猜度到了蒋委员长的下一步行动，必将是要收拾共产党了。

于是鹿钟麟私下里一边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一边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部队不断制造磨擦，破坏团结抗日，在外有日军侵略的情况下，不去抗敌却伺机袭击八路军，暗杀共产党军政人员，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

6 月 11 日，张荫梧乘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主力在前线作战之机，亲自率领 3000 余“民军”，偷袭、包围冀中根据地驻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官兵 400 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

竹沟事变

竹沟镇在河南南部的确山县境内。镇子里住有五六百户人家，四周有城墙，镇外三面临水，俨如一座坚固的小县城。

1939 年，新四军的后方留守处就设在这里。大批从延安来的革命干部，都途经西安来到此处，再分配到大江南北的抗日前线去。

这里是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络站，又是扩大革命力量、培养干部的基地，也是新四军的后勤机关。大批的班、排、连干部，经过这里的教导队训练，源源输送前方，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又到这里来住医院。

留守处的工作做得非常深入，深受当地群众热爱，竹沟的抗日救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

1939 年 10 月间，国民党第 31 集团军少将参议耿明轩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之命，带领两个团的兵力，又纠集河南确山、信阳、泌阳、汝南等县的地方武装、土匪和反动军队约 1800 多人。借口去信阳、确山，要在竹沟镇住下，企图占领竹沟。当时，留守处已接到上级的指示，要警惕国民党的新阴谋，所以，把城门紧闭，没让他们进去。他们便在城外大吵大闹，硬要驻进城。

留守处主任王国华为了团结抗日，顾全大局，把国民党主要军官请进竹沟镇，招待一番，耐心地说服他们，给他们解释城里太小，实在驻不下，苦口婆心地劝说好久，他们才快快而去。

之后，国民党确山县县长许工超，纠合了数县的常备队以及第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慢慢地向竹沟进逼，竹沟已被他们团团围困了。

王国华主任为避免“磨擦”，一方面劝告大家要忍耐点，为民族前途着

想，另一方面派留守处周参谋长去和国民党军谈判。

周参谋长做了一些准备，拿一封留守处的介绍信，来到国民党军军部。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接待了他，周参谋长说明来意，要他们不要把竹沟重重围困了。那军官阴险地笑两声，说他们是听从战区司令部命令行动的。至于许工超那批地方军，他们国军是管不了的。

周参谋长返回向王主任汇报了谈判不成的情况，只好做最后打算，把留守处存放的枪支、子弹与军用物资，通过抗日游击队运往湖北，住在城外的机关、医院，也纷纷迁到镇内。由于镇子太小，医院只迁了一部分。

11月11日清晨，天上乌云密布，下着细雨，阴沉沉。这时，竹沟镇外的枪声响了，国民党的正规军与地方军，果然向新四军的后方留守处发动了进攻。四处一片黑乌乌的人群，包围了一层又一层，机枪、步枪子弹密如雨点。

守卫留守处的少数部队及工作人员，在主任王国华的率领下、奋起自卫抗击，激战两天一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

天上下着雨，墨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周参谋长把机枪调到西城，轻轻开了城门，大家把带不走的枪支、子弹、手榴弹，一捆又一捆地搬出来抛在河里。然后，整理了一下队伍，周参谋长在前，王主任断后，悄悄出了城门，踏进小河，为了避免声响，大家都拖着长裤，顺着水势，慢慢地摸索到对岸。过了河，是半里多的开阔地，大家都手拉手地弯下腰，好像一条长龙，在暗黑的夜里悄悄前进。后经与追敌激战，才甩掉了敌人，在突围作战中留守处周参谋长光荣牺牲。

国民党军队进入竹沟后，惨杀了留守处医院的伤病、残废人员、抗战官兵家属及当地民众 200 多人，留守处的财物被抢劫一空。11月18日，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致电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竹沟事变的罪恶行径，要求严惩肇事凶犯，抚恤死难人员及其家属，并保证今后抗战军人及其家属的安全。

新四军兵站秘密转移

时至 1939 年冬，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且自身队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已经让当时的中国元首蒋介石食量大减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不久他就亲手导演了一幕亲痛仇快的场面，从此在中国历史辞典上多了一个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专用词。

当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时，蒋介石任命反共干将李品仙出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

李品仙一上任就下令封闭《大别山日报》，解散“抗敌动员委员会”及其他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驻在金寨县的新四军第 4 支队兵站，也成了国民党特务们集中注意的目标。

一天，有几个自称是稽查队的家伙，竟贸然跑到兵站来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总部（即国民党五路军总司令部）要我们来登记，不然你们的治安没人负责。”接着，又装做好人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听说李主席要你们早点走，免得走迟了找麻烦！”当时，我们兵站的同志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就是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兵站是公开合法的新四军的后

方机关，用不着你们来登记，治安不治安那是你们的事。老实告诉你们，为了抗日前线需要，我们留在这里，没有上级命令是不走的，任何时候只要有枪，什么麻烦我们也不怕。不过我们明白，你们扛着抗日的旗号不去打鬼子，反来找我们扯皮、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为了什么呀？”那些家伙被这一反问弄得无话可说，只好支吾其词地走了。

但以后他们对兵站的迫害并没停止，而且是变本加厉了。

不久，上级来了命令要兵站迅速撤退。当然，要想白天公开地撤走是办不到的，夜晚走吧，又没有口令，要走出国民党的圈圈也很困难。于是所有人员全部轻装，除带足子弹外，每人只带一套单衣，一双鞋，在一个拂晓冒充国民党军闯出了他们的警戒线，迅速地钻进了大山。

一天的翻山越岭，走出了八九十里路，总算逃出了“老虎口”。但离新四军的前线部队还很远很远。往前走，一路上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如果被他们发觉了，说不定前面有“欢迎”的，后面还有“欢送”的。因此，大家只有白天休息，夜晚行军。

爬过了无数的山头，涉过了大大小小的山涧，穿过了一望无际的丛林，跨过了阻隔去路的浅沟和深壑。八九天后，终于在一个晚上来到了离“江纵”司令部（即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十多里的地方。大家认为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便决定停止前进，好好地睡一觉，准备第二天早上赶到“江纵”司令部吃早饭。由于连日连夜行军的疲劳，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当战士们走到离“江纵”司令部不远的地方——无为天城桥西边的一个村庄上的时候，遇见了几个站在路旁的老百姓，其中一位老者问：“同志，你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他的问话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可是这位大爷仍然堵在路口上问：“你们是不是从后方来？到江纵司令部去的？”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你问这个干啥呀？”战士们还是不住地往前走。

这时，老大爷急忙抢上一步拦住战士们说：“你们赶快回头，广佬（指国民党广西军）前几天就占了开城桥，同‘江纵’拉开了阵势，不过还没开火。这里到桥上不足三里地，拐弯就看到了，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料到快到目的地却又发生了这种新情况。战士们正在踌躇，这位老大爷又很亲切地说：“我们这里虽是一条小路，可又是后方到‘江纵’去的交通要道，新四军从后方来的同志都打这里经过。自开城桥被广佬占了以后，为了不让同志们闯到那里，我们就自动地组织起来，不分昼夜守着这个路口，专给同志们打招呼！”

老大爷的话说到这里，战士们都不由向前跨了几步，以万分感激的心情说：“谢谢你，老大爷，你们太辛苦了！”

老大爷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说：“同志，新四军同鬼子拚死拚活，还不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国民党打鬼子没本事，残害老百姓倒很有劲，自从开城桥被他们占领以后，我们这一带已搞得鸡犬不宁了。”

之后，老大爷带他们回村，吃了早饭，又安排3个小伙子做向导，准备绕道前进。战士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和乡亲们告辞了。

本来只有几里地的路程，这一绕道就绕了五六十里。在细雨蒙蒙中沿着巢湖边的一条小道走了一天，到“江纵”司令部刚好赶上吃晚饭。战士们一到“江纵”，首长们就喜出望外地说：“好哇！你们到底来了！这是一件大幸事，也是一个胜利。你们离开那里的第三天我们就得到消息，说你们已经走在路上了。国民党在你们走后的第二天就去了一个连，把你们住的地方包

围起来，结果扑了一个空。据说李品仙在知道你们走了后还拍桌子打板凳地说：‘啊！新四军的兵站为何不辞而别？’”

十二月事变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对晋西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发起进攻，同时在隰县、晋城等六县地区，摧残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群众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这一系列事件，当时称十二月事变。

这里在国民党蒋介石忙于筹划和安排全国性反共高潮的同时，阎锡山在晋西北地区也开始了丑恶表演。

阎锡山可谓近代军阀之中的典型人物。几十年征杀，他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捭阖，像一艘沉不掉的航空母舰，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见他列在前排醒目的桅杆。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处事信条，他竟能把山西这个独立王国不可思议地支撑了近二十年。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曾一度表现积极，采取联共拥蒋策略，一度把山西、绥远变成了全国抗战的旗帜。忻口、太原战役期间，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名声。同时，他惨淡经营的晋绥军也损失了70%，这也着实让他心疼了一阵子。尤其当他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共表演之后，他也开始向反面变化了。

1938年3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念投降经了。他对校尉级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蒋先生的脑子里，决无什么抗战的意思。今日面对的只是怎样妥协。我们要看清形势。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们就要赶紧准备雨伞草帽，否则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汤鸡。”同年6月，他对军、师级军官说：“不应该再和敌人死拼了，要不然，再有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这个会就成了预先给你们开的追悼会。抗战以来，我们差不多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加上同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的地方吗？”1939年3月，他在黄河西岸宜川县秋林村高级干部会上提出无条件存在，对亲信解释说：“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因为日本人力量最大，咱们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这个窟窿。汪先生出走，哪里是当汉奸，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还不郊迎60里？”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下属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19军军长王靖国等人的名义派人去和日本人谈判。条件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发还其部下高级将领在日占区的财产，他愿意在山西作为日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一个“屏障”。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但要求他像汪精卫那样向全国发个通电。

阎锡山权衡良久，没敢立即答应。

他当然知道要是真摊上个汉奸帽子，就要遗臭万年了，因此，他还不想立马吊死在日本这棵树上。他作的是这样的梦：名分上还在抗日，实际不抗日，保全气节；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清理好山西这块自留地，继续做土皇帝。他虽没答应发通电投降日本人，但决定作个姿态拿个样给日本人看看。

11月底，机会来了。按蒋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发动全国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国卷入中国事变的可能性。12月1日，阎锡山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破袭同蒲路，同时令嫡系部队作预备队跟进，企图把新军前后夹击歼灭，求得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

谁知决死二纵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阎锡山图穷匕见，当即宣布新军决死二纵队叛变，通令全国进行讨伐。

新军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1937年底，阎锡山的晋绥军溃不成军之时，求薄一波帮他建立一支新部队。到1939年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50个团5万余人，受阎锡山和共产党的双重领导。

共产党当然不能坐视山西新军被歼。

12月7日，八路军晋西支队立即和决死二纵队一同抗敌。12月16日，阎锡山又令赵承绶第七集团军参加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电令八路军120师派得力指挥员到新军帮助指挥作战。12月31日，中共中央再令八路军358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贺龙、关向应也回兵晋西北。

1940年元月11日，八路军和新军开始反击，连克临县、杨集镇等地。至此，晋西北地区完全被共产党控制。

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只好答应和共产党谈判，划界而治。

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看着大片的国土丢失，不去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却眼盯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真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专家。他们由制造小规模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驻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个县城。他们还进犯边区东部绥德警备区，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

然而对这些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和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方面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顽军，恢复陇东大部地区。由雁北返回陕甘宁边区的359旅进驻绥德，迅速平息绥德警备区内的武装叛乱，赶跑反共分子国民党绥德专员兼县长何绍南，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真是无独有偶。在山西，阎锡山的反共活动也在加紧进行。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的武装力量，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阎锡山却把这些抗日力量看成异己势力。阎锡山虽然自己已经退却到晋西南一角，却不惜破坏抗日团结来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一面密谋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他调动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水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干部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数十人。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第八集团军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

队先后对活动在晋东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 500 余人，抓捕 1000 余人，还策动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对阎军的进犯进行反击后，在八路军 120 师新 358 旅的接应下，转移到晋西北根据地。1940 年 1 月，晋西北的八路军新 358 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灭阎军一部，赵弃城逃跑。2 月，贺龙、关向应率 120 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阎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对太行山南部蒋介石嫡系部队取守势。1 月，八路军 368 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344 旅、晋豫边支队、决死第一纵队，给反共军以严重打击。随后 385、386 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阎锡山的军事进攻被打退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磨擦。2 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4 月初，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和蒋介石要乘隙而入的情况下，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 年 12 月初，国民党第 97 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为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会谈，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侯如塘部和乔明礼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 年 1 月，国民党第 69 军石友三部 1.7 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这两起进攻都被击退。2 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 129 师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在平汉路东，八路军集中 25 个团的兵力，在宋任穷、程子华的统一指挥下，于 2、3 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顽军大部，其余部逃往旧黄河道以南。3 月 5 日，八路军集中平汉路西各部主力 13 个团，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四天中，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在斗争中，共产党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利用顽固势力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力争其他部队保持中立。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3 月中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被打退后，又将反共磨擦的重点逐渐

转向华中。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加以消灭。中原局和新四军领导机关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了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战，打破了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了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鉴于华中地区的磨擦日趋紧张，中共中央于5月4日再次指示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迅速传达中央指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向苏北发展。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第三战区第二游击战区冷欣部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党中央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在苏北的力量，除韩德勤部外，还有泰州地方实力派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和属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队陈泰运部。新四军奋起自卫。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扩大统一战线，指挥部确定联李，击日，反韩的策略方针。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亲自出面与“二李”联系，重申团结抗日主张，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表示感谢，同新四军恢复原已初步建立的合作关系。7月下旬，北渡长江的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3个纵队共7000余人。随后该部东进，到达泰兴、靖江、如皋一带沦陷区，黄桥一战，彻底挫败敌韩德勤部，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至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迫使其重回抗日合作的轨道上来。

皖南事变

1940年前后，苏皖两地新四军猛烈扩展。这足以使蒋介石感到不快、不安。降不成拉不过，那么只有武力了。因此蒋介石准备武力消灭新四军的思想早已形成，需要的只是择机而动。

尽管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在与国民党军队相处时小心谨慎，以求共同抗日；然而，危险还是一步步逼近了！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反动将军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在电文中大肆诬蔑我八路军与新四军，并强迫命令我们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发出“佳”电，除对“皓”电的造谣加以严正驳斥外，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

这样，蒋介石为难了，窗户纸没有捅破，仍是在一个锅里搅勺子的家里人，又把“家长”的气派举过了头顶，能马上变脸吗？何况人家已答应了部队北移。

然而，蒋介石武力解决新四军的想法一点没有动摇，内战准备一点也没停止。10日，汤恩伯、覃连芳部11个师作好了开赴皖北的一切准备，同时东北军第57军已开始由鲁南向苏北转移。14日，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制定的《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散发着油墨气味，就等着蒋介石的签发了。两天后，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的20万人已接到攻击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预备令。顾祝同已开始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

部队。

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部队决定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天目山脚）沿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

国民党顾祝同得此情报后，立即做了两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团军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派人向日军泄露了新四军上报的北移线路，以借刀杀人。可见，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又一次在上将军顾祝同身上得到了验证。

12月底，新四军军部将皖南部队调到云岭地区，准备北移，以老一团、新一团编为第一纵队，老三团、新三团编为第二纵队，五团和军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其余尚有军直、教导队五个队以及通讯、侦察、警卫等三个连。

云岭，我军部驻在这儿已三年了，三年的抗战过程中，皖南部队已与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之缘。现在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只好委曲求全告别皖南。

1941年1月4日夜，军民依依惜别，部队里响起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声：

刺刀闪光，子弹上膛，
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

别了，三年的皖南！

三个纵队，分三路向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前进。晚上天黑如墨，部队打起灯笼火把，如多条火龙，蜿蜒游动于起伏的山峦，织成奇景壮观。

连日雨水，山径泥泞。河水陡涨，章家渡的浮桥也被冲坏，只好涉水，部队行动困难，甚为疲劳，走到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一线。

6日下午，特务团前哨部队到达丕岭，就遭到国民党军40师的堵击，蒋介石反人民的枪声响了。军部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决定以一纵出击求岭，二纵出击丕岭、博刀岭，三纵特务团出击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是晚，崇山峻岭中枪声四起，部队和敌人展开了争夺山头的拚杀。7日拂晓，各部已将指定的各山头占领，继续前进。19时，军部越过丕岭，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准备攻下星潭后，分二路向三溪敌40师师部处突围。但各部行动后，即遇到敌人碉堡内的火力封锁。这些碉堡是早已修好了的，国民党的阴谋计划，早在一月前就有所布置了。

8日夜，敌总指挥上官云相命其各部，向皖南新四军发起总攻击。8万多国民党军包围着9千余人的新四军，情况不言而喻。

军部让三团为前卫，五团为后卫，向茂林方向进发。夜里，大雨滂沱，军直至高坦时，敌144师已向高坦猛攻，此时，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混战了一夜。9日晨，叶军长仍在前线，以教导队增援三团，士气大振，激战一日，将144师全部击退。部队伤亡甚大。当天晚上，叶军长又决定率全部人员经泾县与丁家渡之间的青弋江至孤峰突围，黄昏开始行动。沿途遭到敌军袭击，且战且走，情况十分混乱，一夜只走了20余里，于是，全军退入葫芦形横直5、6里的石井坑中。

10日上午，敌144师占廉岭，下午占丕岭，分二路向石井坑进攻，敌52师、108师已赶至大康王一带，渐向石井坑进逼，战局已至十分危险的地步了。军部决定固守石井坑，整顿部队，以便待机突围。于是在石井坑周围的山头上，展开了猛烈的激战。在最高的阵地东流山头上，敌人用炮火猛烈轰击，然后每次总以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新四军人数有限，缺粮缺弹，大家先

以手榴弹打，手榴弹打完以石头砸，再后就展开白刃格斗、山坡上弹坑密布，血肉横飞……

就在新四军在皖南激战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焦急中运筹。9日上午，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10日，刘少奇又转来叶挺、饶石电：“项、袁等率小部队不辞而别，行动不明，部从受包围激战。”接着刘少奇报告道：“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部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

11日，毛泽东等电告刘少奇、陈毅：“你们应就近随时去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12日，毛泽东等又经刘、陈电示叶、饶：“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对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谈判已无济于事，13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立即改变了策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雪枫、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

然而，皖南局势已非，悲剧已不可避免。

新四军部队在石井坑激战至13日后，敌人占了东流山头，特务团阵地亦为40师击破，石井坑被打得到处燃烧起来！竹林、房屋、山头冒着浓烟，进入混战状态，指挥机关不能立足。当夜，军长率教导队及军直机关人员突围至大康王、坑口处，被108师堵击，部队被敌冲散。叶挺、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同志去和国民党军队谈判被敌人扣留。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所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只有二纵队傅秋涛部与特务团及其他零星部队共千余人冲破敌人封锁，越过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

用得意忘形来形容蒋介石此时的心态再恰当不过了。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发表通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决定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妄图一手掩盖天下人之耳目。但，这种所谓的审判，始终未敢举行，显然，真正的罪犯是他们自己，如果审判，叶挺将成为真正的判官，向全世界表白这千古奇冤与反动派的罪状。

日方、汉奸，更为“皖南事变”拍手称快。在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同日，日本同盟社在南京发出电讯称：“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北移，遂开始在东流山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十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也以“完成皖南剿共未意之攻”为口号，向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攻击，“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

汉奸汪精卫还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地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好事！”

毛泽东这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1月19日他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战略防御；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

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二是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

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转国民党中央，该办法共有：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等；恢复叶挺自由等12条。

对此，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然而，他又不能真的撕破脸打全面内战，一时也极为尴尬。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等人打电报怒斥蒋介石，指出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被迫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其间，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揭露和抗议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

1940年前后，苏皖两地新四军猛烈扩展，这使蒋介石感到极其不安。他曾绞尽脑汁地拉拢，后又以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受降于他，结果都被现实击破，这使得蒋介石恼羞成怒，降不成拉不过，那么只有动武了。

因此，一个阴谋就产生了。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经苏南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早已准备好的国民党第三战区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新四军被迫还击，经八昼夜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部队被打散。新四军领导人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所杀，袁国平战死。部队伤亡5000余人。铸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得手了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迫不及待地发表通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决定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针对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和分裂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日召开会议，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二是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谈话中，中国共产党抗议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分裂投降阴谋，对皖南事变提出了十二条善后办法。呼吁全国人民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同时仍然希望国民党反动派能有所觉悟，共同抗日。

当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8日，在苏北召开了新军部成立大会，陈毅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激昂坚定地说：今后，新四军直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之下，就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刘少奇和陈毅同志一道，率领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重整旗鼓，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列入新四军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共9万余人。

一师，由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江苏中部的苏中解放区。

二师，由江北指挥部第四、第五支队和当地游击队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安徽东部与江苏一部的淮南解放区。

三师，由八路军南下部队和苏北地区的部队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江苏北部的苏北解放区。

四师，由豫东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新四军第六支队和苏北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津浦路东、运河以西的淮北解放区。

五师，由鄂豫边挺进纵队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及中部、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的鄂、赣、湘、皖解放区。

六师，由苏南指挥部、新二支队、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江苏南部和安徽一部的苏南解放区。

七师，由皖南事变突围的许多部队，加上江北游击纵队和江南渡江部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该部活动于皖中解放区。

此外，还有独立旅。不久，在浙江东部还建立了浙东游击纵队，该部活动于浙东解放区。

如果说，新四军过去仅达到游击兵团的程度，那么，皖南事变后，却已迅速地发展壮大为正规化的大兵团了。

陈毅同志后来说，如果问：新四军从皖南事变的危害中摆脱出来，有什么宝贵的经验？那我们正面的回答：最大一点，就是在最紧急的关头，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的团结精神，战胜了对方分裂投降的阴谋活动，绝不因别人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我们临危不乱的团结精神，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流血的代价。但终于克服了反共投降的危险，保证了抗战大业的继续前进。

厂窑大屠杀惨案

1943年3月，3万余日军从湖北荆江各个渡口大举南犯。此时，在滨湖一带的中国军队实际计有10万余人，有国民党的第73军和44军一部，无疑在军事上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军中投敌风正盛，当年国民党将官投敌58人，中央执委投敌22人，投降的国民党军队为50万人之多。此时的中国统治者、反共高手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披露了他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使得他的那些得力将校们把目光和军事才能多用于对付共产党上而不是侵略者的日军。

这无疑是中国的悲剧，是中国人的灾难。

基于这一情况，当日军南犯之时，中国军队虽数倍于入侵日军之兵力，却一触即溃，纷纷西逃，不到两个月，半壁洞庭拱手让敌。大批逃难民众和溃兵涌入厂窑地区。

厂窑位于湖南洞庭湖北岸，系由28个小垸并成的湖洲大垸，三面环水，犹如半岛，面积50余平方公里。

5月8日，3000余名日军从水陆两路合围厂窑，截断了73军残部和逃难民众的西撤退路。从9月11日，这3000名日军三天中屠杀了32000多中国人。

在永固垸，日军屠杀了 2000 多人。日军将人们成串捆绑至各个场屋，实行集体屠杀，或捆绑后推入水塘淹死。在戴吉禄禾场上，日军把 120 多人绑在两排杨树上，每棵树绑三四个人，先用机枪扫射，没死的再用刺刀刺杀。肖明生一家 29 口人，老的 80 多岁，小的不满周岁，就有 25 人遇难，其中 18 人是在被推入水塘淹死的。

在瓦连堤，日军屠杀了 3000 多人。人们纷纷躲到沟港、树丛、庄稼地里藏身，日军即排成长队沿大堤两侧作了几次梳篦式的踏青扫荡，见人就杀，一个不留。7 里多长的瓦连堤，平均每华里被杀死 430 多人。

在 2000 多米长、200 余米宽的甸安河，云集着近 4000 名溃兵和难民，日军用飞机炸，骑兵冲，步兵搜杀。人们在弹丸之地进退不得，几乎全部被屠杀。

在厂窑沿河水域，3000 余艘民船和近万名船民、难民被日军堵截。日军把人们赶上岸，把船上的财物抢空，放火将船全部烧毁，大火几昼夜不熄。

残酷的侵略者，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以杀人为乐，以杀人取乐。日军对船民和难民，除集体屠杀、枪杀和刺杀外，还将三五十人一串，用纤绳拴在汽艇后面，调速疾驶，直至全部拖死淹死。日军又用长纤绳以活套逐人套上脖子，用力绷直，把人们赶入水中，将头尾两人砍死，越挣扎绳结越紧，直到全部勒死淹死。

沿河的船民和难民，被日军屠杀者达 6800 多人。

在连山垸一带，日军屠杀了 1000 多人。在里中湖周围，屠杀了 800 多人。

与厂窑相邻地区，在三岔河，日军屠杀了 2000 多人。在下柴市，屠杀了 1500 余人。在游港乡，屠杀了 1000 余人。在武圣公，屠杀了 500 余人。在安乡边界，屠杀了 1000 余人。

这些用血作出的统计，永远记载着日军侵华的暴行。

同成垸有一位 60 岁的汪宏奎，有些耳聋，日军见他不答话，即用刀将其舌头连下颚一齐割掉，几天后惨痛而死。瓦连堤的彭连山患病行动迟缓，日军用东洋刀把他砍成数块，将碎尸抛入藕塘。日军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用刺刀将他的肚子剖开，塞入咸菜。日军还用铁丝穿锁骨，把十几个人连成一串，做步枪射击“穿透能力”的实验。农民高丰华的孙子仅 1 岁多，日军将刺刀从他的胸口刺进去，扛在肩上，走了半里多路，再扔进烧房子的大火中。在肖家垸，两个难民被日军绑在树上，剖开肚子取出胆，将胆汁挤入随身携带的瓶子中。

这帮行走着的兽类，暴行仍在继续。

茅草街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被两个日军轮奸，其母痛恨，与女投河而死。一个 12 岁的船家女，被一群日军轮奸致死，尸体扔进河中。一名 62 岁的老嫗，被 8 个日军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刺到小腹致死。肖家湾一未婚女子，被 13 个日军轮奸昏迷后，将糠灰搅入阴道，最后插入刺刀。16 岁的肖姓姑娘，被一日军抓住企图施暴，姑娘奋力挣脱奔跑，日军追至河边将其抓住，姑娘拖住那个日军一起滚入河中，同归于尽。

据统计，在厂窑大屠杀惨案中，日军共杀害我同胞 32000 多人。其中厂窑乡被杀害 7000 多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全家被杀绝的 200 余户，外地难民被杀害 12000 多人，73 军等部官兵被杀害者 5000 多人，厂窑附近地区被杀害 6000 多人。此外，致伤残者 3000 多人，被强奸的妇女 2000 多人。同时，仅厂窑乡被烧毁房屋 3000 多间、船只 2500 多艘，被杀、抢牛 200 余

头，猪 4000 余头，家禽近 1 万只，烧、抢粮食 50 万斤，衣物 5 万余件，损毁农具近 1 万件。

日军使用毒气屠杀中国军民

使用化学毒气屠杀生命之行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和禁止。但是日本法西斯不仅多次大规模明目张胆地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毒杀中国官兵，而且对和平居民也施放毒气，造成无辜百姓中毒身亡。在长达 15 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使用毒气至少在 2000 次以上，施毒地点波及 18 个省、区，造成 8 万余中国军民的伤亡。其中仅从 1937 年至 1944 年，日本侵略军使用毒气次数高达 1312 次，伤亡达 36968 人，其中 2086 人死去，占中毒者的 5.64%。这还只限于国民党军队和其统治区的统计。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中毒死亡人数，及日军在敌后战场、清乡、“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时，施放毒气的次数及死亡人数未计算在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总共约生产了 7400 吨化学武器，700 万发毒气弹，这些毒气弹绝大部分用于中国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重视研究和生产毒气弹，更重视培训使用毒气的军事人员，尤其在裕仁天皇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任陆军参谋总长期间，更加重视发展化学武器和培训懂毒气的军事人员。1933 年 8 月在千叶县津田町建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使用化学毒气弹的军官和军士。这所学校先后培训了 1 万余人，后来都成为发展毒气战的骨干，把他们派到侵华战场最前线的部队里，传授和普及化学战知识，并带头在实战中使用毒气弹。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的教材——《七·七事变时期化学战例证集》这一重要史料。《例证集》收集了 1938 年 7 月至 1942 年 11 月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 77 次之多的 56 种化学毒气战战例，逐例介绍了作战意图、“一般情况”、“战斗经过概要”及“教训”，并对 7 种战斗类型：1. 阵地进攻战；2. 遭遇战；3. 夜间进攻战；4. 防卫战；5. 追击战和撤退战；6. 对特殊地区的战斗；7. 对游击队的战斗等使用毒气的典型事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便指导“瓦斯用法”、“红筒的快速敏捷之具体运用”、“适应军队现状”，为日军实战服务。该《例证集》搜集的战例，其目的是作为培训使用毒气弹军事干部的教材，现在却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武器的罪恶记录。

1938 年 5 月中旬，我军乘日军将驻扎在山西第一军的几个师团抽调南下，参加徐州战役，驻晋南曲沃的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向驻扎在曲沃一带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切断同蒲线，使日军后勤供应断绝，驻扎在曲沃的 20 师团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这时日军第一军调派兵力，解救被困日军。在解围战中，日军使用了大量毒气。准备了 18000 个中型红筒，使用了 7000 个，结果毒气完全遮盖了我方阵地，日军乘机突围出去。

日军攻陷南京后，1938 年 6 月准备进攻武汉，分江南岸和江北岸两面向武汉出击。日军第 2 军第 10 师团在长江以北连续攻占六安、固始，9 月 17 日攻打光州城，在进攻中，日军发射中型红筒 835 个，小发烟筒 116 个，然后随烟雾和毒气从该城东门攻入城内，用刺刀砍杀中毒军民 200 余人。日军第 6 师从汉口北的载家山一带进攻汉口，因南京政府在载家山建筑坚固防

线，并有 1000 米宽的黄土湖防守阵地，日军于 10 月 25 日，用迫击炮发射了红弹 80 发，压住火力后才冲破中国军队的军事防线，打开了攻克武汉的北大门。

此外，日军第 6 师团沿长江北岸西进，在攻打田家镇时，遇我守军坚强抵抗。田家镇是武汉锁钥之地，也是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失与守关系到武汉的安危存亡。在日军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第 2 军司令官东尔稔和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下令使用毒气，1933 年 8 月 23 日，开始发射毒气弹，我方守军一无防毒面具，二无毒气战作战知识的经验，当毒气袭来，我军官兵纷纷中毒。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于南昌发出一则电讯说：“日寇使用毒气！我两营官兵，除营长（李戈）因事前负伤扶出火线，排长及一中士中毒较轻外，余在原地作战，均壮烈牺牲，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武汉失守后，南昌就成为日军军事攻击的重要目标。1939 年 1 月冈村宁茨制定了攻占南昌的作战计划，3 月冈村宁茨指挥日军第 6、第 101 和第 106 师团（师）等三个师团向南昌发起进攻。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团在武汉会战中被我方打击，损失巨大，士气不振。因此冈村宁茨集结重炮 3 个连队（团）、独立野战炮 1 个大队（营），攻城重炮 1 个大队，加上 2 个师团的山炮，展开“七·七”事变以来最大的一次炮战，借以鼓舞这两个师团的士气。3 月 20 日，日军 200 余门大炮齐放，以强大火力摧毁修水南岸的中国军队阵地，日军三个师团从左右两侧渡修水，这时主军第 106 师团发出红筒 1 万个，红弹 2000 发，右军第 101 师团发射中型红筒 5000 个，红弹 1000 发，以压住正面 12 公里、纵深 2 公里的我方阵地，强行渡过修水。我守军上至师团长，下至士兵纷纷中毒，被迫后撤，日军乘机逼近南昌，4 月初攻克南昌。

1941 年 9 月，驻扎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 11 军集中兵力要攻打长沙。为牵制日军南下，国民党政府命第 6 战区司令官陈诚，立即攻克宜昌。对驻守在宜昌日军第 13 师团发动猛烈进攻，日军完全被包围，处于全军覆灭境地，日军的师团长要烧掉军旗，准备自杀。这时该师团山炮第 19 联队（团）作困兽犹斗，发射毒气弹，从 10 月 7 日至 11 日 5 天中，发射黄弹 1000 发，红弹 1500 发，中国军队大多中毒，蒋介石下令撤出宜昌城外。这次化学毒气战，日军使用的是芥子气和氰化气体，还使用了路易氏毒气。

侵华日军不仅在正面战场上施放毒气，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同样施放毒气，进行化学毒气战。1939 年 1 月，贺龙同志指挥的 120 师奉党中央的命令，从晋西北挺进冀中抗日，执行巩固和扩大冀中根据地的任务。120 师抵达后，该师 716 团在齐会村与驻扎河间的日军第 27 师吉田大队展开了一次激战。4 月 23 日，上午 9 时，日军包围该团第 3 营的驻地齐会村，在炮火的配合下日军发动了进攻，我军战士连续打退敌人的 3 次进攻，日军见强攻不下，便施放毒气弹，一团团白色烟雾在头上散开，战士们用水浸湿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在 1、2 营的配合下，歼灭日军 700 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向 120 师师部所在的大朱村也发射了毒气弹，正在该村村沿指挥战斗的贺龙师长和司令部的 20 余人中毒。

1942 年 5 月 27 日，日军对冀中定县北疃村地道中施放毒气，毒杀民众 8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

1943 年 11 月 9 日，日军在山东根据地的井陘县考窝村一带扫荡时，将 100 余名躲在山洞内的人民群众，全部毒死在洞内。

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军侵华期间举不胜举，侵略者在对根据地进行了大扫

荡，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配以毒气屠杀根据地军民不计其数，死伤数万人。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东北 16 个县市，30 多处发现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毒气武器，总计有 200 多万发，约 13000 余吨。仅敦化县的一个 2 号坑，就掩埋处理了废毒弹四五百吨。敦化从 1951 年成立“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 1966 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 1954 年就支出现金 17 亿多元（旧币）。截止到 1987 年，敦化因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即达 500 多人。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还时常有发现日军遗留的毒剂弹的报告。50 多年前侵华日军的所为，至今还在危害和伤害着中国人民。

潘家峪惨案

在中国冀东位于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丰润县城以北 60 里处有这样一个村庄。全村有 220 户人家，1700 口人，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祸及到此时，全村人奋起抗暴，男女老少皆投入到了抗敌的前沿，对敌斗争搞得火热，因此成为八路军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

这里的人们以其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积极开展灵活的对敌斗争，他们白天到村里种地，晚上住山上，日军多次扫荡都未能得手。使日本鬼子一时感到一筹莫展。从 1938 年夏到 1940 年底，日军对该村围攻 130 多次，次次都以扑空和失败而告终。无奈日军只有在其附近建成了许多据点，设立保甲组织，到各村征粮派款，但对这个村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远远看着，视为眼中钉。

这个村庄就是河北唐山丰润县的潘家峪村。

然而，在 1945 年 1 月下旬，数九寒天，山上越来越难住了，春节前夕，人们陆续回到村里，准备过年。

虎视眈眈的鬼子，早已被多次扫荡扑空的怨气所激怒。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这一机会岂能放过。遂纠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唐山等地的日、伪军 3000 多人，在驻唐山日军守备指挥官佐佐木高桑的指挥下，杀气腾腾地向潘家峪而来。

1 月 25 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潘家峪，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便开始了。

早上七八点，日军开始挨门破户搜人，把全村 1400 多人都赶到了村中的西大坑。老弱病残不能走的，都被日军当场杀死。在西大坑，日军拉出几十名年轻的妇女和男人为他们去烧火做饭，事后，将这些妇女全部奸污，和做饭的男人一齐杀死。

集中在西大坑的村民逾千，日军怕屠杀时不易控制，遂另选定潘家大院作为杀人场。该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军在院子里铺了一两尺厚的柴草树枝，浇上煤油，土墩和平房上架了机枪。约 10 点钟，日军将人群赶进潘家大院。人们往外冲，十几个青年冲到门口就被日军全部用刺刀刺死。几个老人出面，求日军放过妇女和孩子，日军的回答是用刀砍下了他们的头。

日军先在东院的二门外点着了大火，机枪和步枪一齐向院里的人群射

击，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人群成片地倒下，活着的人东冲西突。有的人翻过了院墙，十几个人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潘辅庭等 30 余人躲进东院粮仓，幸与其他房屋不相连而逃生。但是，院里的绝大多数村民都没有逃过大火、枪弹和日本刀。仅西院柴草房和宅屋的夹道中，就死了 200 多人。

大火焚烧后，日军又轮番补枪，发现东墙根尸体堆里有人没死，再扔手榴弹。撤离前，日军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个别藏在尸体堆下的活人，忍受不了烈火烧身，跳进院子的深井中。

接着凶残的日军又在村里村外进行搜索、抢劫和纵火。在村外南坡搜出 32 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把他们赶到南崖上全部杀害，将尸体挑下崖，盖上柴浇上油，点火焚尸。

惨案过后 6 天，《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来到现场，拍下许多照片，写出《惨案现场观察记》。

《惨案记》中记述道：

“特别触目惊心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侧石槽上一具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的崩裂，那一定是遇到鬼子以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肚肠上。

“最使我愤痛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里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肢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碳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半焦黑的孩子尸身上还能发现三八式刺刀的戳伤，还有血污。受伤的孩子们先遭受到杀伤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熬。我们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儿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地毁灭了。

“暴露在白薯窖边的女尸，据一个农民告诉我，这些都是些年轻貌俊的女子，有闺女，也有媳妇。鬼子把全庄的人圈在西大坑以后，说让她们去做饭，硬把她们推下白薯窖。以后只听到白薯窖里的怒骂、哭号。不一会儿女孩子的声音慢慢低哑了，又歇一会儿，突然一声女人的惨叫，就没声音了。这时才看见鬼子爬出窖来，点燃几捆玉米秸往窖里扔。

“我们所看到的大约 30 多具女尸是如此：赤身裸体，身上没有一块布片。她们是先遭鬼子奸污，再是戳死，最后是遭火焚烧。死者的下身最惨，鬼子奸污了她们又以刺刀挑破她们的下身，肚肠拖出，头发、上身、脸上沾满血污。

“向大院里尸丛中再看一眼吧。有许多已经分不清是男是女，零碎的肢体中，有的只剩下一条腿，一只小脚。

“惨死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儿，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这就是史书上的潘家峪惨案，这凶残的现实、血腥的景象，也只有日军这帮“兽类集团”才能创造，他们是变态的人性，十足的兽性。

据不完全统计，在潘家峪惨案中，日军杀害村民 1230 余人，烧毁房屋 1100 多间，所有的财物都被烧劫一空。在大屠杀中仅有 276 人逃生，只剩惨案前的 1/5。

战略大反攻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在中国战场，日寇虽垂死挣扎，但已开始出现大崩溃的局面。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指出：“对日战争正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8月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令其限期交出全部武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紧接着，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多号命令，令各路大军实施战略反攻。

根据命令，8月11日，我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其所辖的日军缴械投降。日军拒不投降，我军即以11万主力部队，民兵6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对已陷入困境的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

由冀察、冀中、冀热辽军区主力组成的平津反攻部队于8月12日神速出击，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北平，先后攻占通县、顺义、南苑、丰台、长辛店等地，切断了北平通往古北口的铁路交通，并向北平城紧缩攻击。8月12日，冀中军区以13个团的兵力，由天津西面和西南面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收复韩柳堡、杨柳青、杨村等地，切断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使天津的日伪军处于三面夹击之中。日军大惊，伪军纷纷动摇，大批投降。为策应对平津之敌的围攻，我主力部队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先后对保定、石家庄的敌人发起进攻。夜袭了伪绥靖军第六集团司令部，歼敌1100余人。在唐山周围，先后收复古冶、赵各庄、开平等地，歼敌2000余人。

在察哈尔地区，我军配合苏蒙联军发起进攻，先后解放万全和张家口市，歼敌2000余人，缴获70余座仓库的枪枝弹药和物资，获得骡马近万匹，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及伪张家口市长均被俘获。我塞外察北骑兵支队等武装，相继解放了多伦、康保、宝源、化德、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等地，歼敌2000余人。随后，晋察冀主力一部，又乘胜连续攻克平绥铁路线及附近的宣化、新保安、怀来、延庄、永宁、赤城等地，至此，察哈尔省20个县市、18个盟旗的200万人民获得解放。

在热河地区，我军分两路突击，8月中旬先后解放了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兴隆、承德等地，并在承德与苏军合师。迫使热河区近万伪军和警察起义、缴械。连续收复了8座县城。

在冀东地区，我军向敌发出通牒遭拒绝后，即从南北两翼向驻守山海关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我军炸开了城门，夺取了城内制高点，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城楼之上，歼灭了守敌2000余众。随后，部队继续沿北宁线铁路向锦州、沈阳、吉林挺进。

从1945年8月至11月，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民在大反攻中，英勇战斗，共歼日伪军7万余人，察哈尔、热河两省全境解放，河北、山西、绥远、辽宁各省的一些地方也获解放，收复了张家口、宣化、集宁、承德、秦皇岛、锦州等70多座城市，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由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武装，从8月12日起，先后收复平绥铁路以北的

武川、陶林县城，占领了旗下营、白塔等车站，完全切断了归绥铁路，使归绥守敌陷入四面包围之中。8月18日，我军主力一部向归绥市发起总攻，迅猛冲入市区，激战十多小时，歼敌伪千余人，该城遂告收复。9月6日，我军向另一处守敌进攻，经3天攻坚，终于突破高达十米的城墙，全歼守敌，俘伪军少将城防司令以下官兵1100余名。在这次战斗的震慑下，大武、上芦桥等一批据点的伪军纷纷缴械投降。9月12日，受围困的日军被迫放弃静乐县城，望风而逃。至此，晋绥军区在反攻作战中，共毙伤日伪军16000余人，俘日伪军5100余人，收复了十多座县城和大批村庄。

我晋冀鲁豫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大反攻。太行部队连克博爱、辉县、获嘉，切断道清路西段，收复潞城、襄垣及各要点。平汉路以西部队也攻克昔阳、赞皇，破击平汉路多处。8月底，又相继攻占武陟、温县，9月8日，围攻焦作，歼敌1500余人，随后又解放了修武、沁阳等地。至此，黄河北岸的重要渡口大都被我收复。

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于8月20日向平遥、介休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肃清同蒲铁路沿线灵石、霍县、赵城、洪桐及其东侧翼城、绛县等县城的外围据点，切断了介休至临汾的铁路，对日伪军实施分割包围，迫使敌纷纷投降。

冀鲁豫军区将主力编成南、北、中三路大军，分别向开封、安阳、新乡之敌出击，先后攻占延津、阳武、封丘，切断陇海路，形成对开封的包围。各地武装和民兵也积极作战，攻克东阿、平阴、肥城、长清、鱼台、沛县等地。8月中旬，我军向延津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日伪军1500余人。在攻克阳武和封丘战斗中，又歼敌2000余人。接着又攻克长垣、曹县，歼敌5000之众。9月底，收复汤阴县城，全歼守敌2200余人。在我军民猛烈攻击下，平汉线、德石线、陇海线等主要铁路干线均被我切断。8月28日，冀南部队攻克清平县城。8月31日，对临清三千守敌发起攻击，生俘伪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9月4日，攻克夏津县城，歼敌1600余人。10月1日黄昏，我军攻入重镇邯郸，俘敌1700余人。继之攻克邢台，将附近伪保安团3000余人一网打尽。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从8月11日至9月20日，仅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攻克据点数百处。至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全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军队30万，民兵40万。成为我最大的解放区之一。

大反攻期间，山东军区8个野战军、15个旅兵分5路实施反攻。迅速收复了胶东半岛大部，解放了胶济、津浦、陇海线之间的广大地区，直逼青岛、济南。

山东军区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共歼日伪军6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卫等城市、港口6处，火车站35处。山东军区部队发展到27万人。

在江南抗战的我新四军部队也及时地转入了战略大反攻。我苏浙军区主力，先后攻占溧阳、金坛、长兴、溧水等县城。江北新四军部队连克沭阳、涟水、定远、盱眙、天长、六合、无为、杨中等县、直逼津浦、淮南铁路。淮北军区部队，先克永城，又克灵璧、萧县等地。苏北军区部队发起了两淮战役，收复了淮阴、淮安。苏中军区部队发起盐城战役，解放了盐城、东台、靖江、海门等重要城镇一百余处。我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沿平汉铁路东侧南

下，向京山、汉川、黄陂、舞阳方向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华中军区军民在陈毅领导下，在大反攻中共歼敌 7 万余人，解放县城 40 座。华中解放区人口达到 430 多万，军队 31 万人，民兵 80 余万人。

活动在华南的我各抗日游击队也向日伪军进行了全面反攻。经一个多月的奋战，东江纵队先后收复了惠阳、宝安、东莞、海丰、陆丰等大小城镇 60 余处。琼崖纵队先后攻克县城 2 座，大小村镇 180 余处，建立了遍及全海南岛的 16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人口达 200 万，部队达万余人。

抗战时间最长的我东北抗日联军，以更加积极地行动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在苏军占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策应下，积极地向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大连、绥化等 57 个大中城市挺进，迅速消灭日伪残余势力，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仅一个月的时间，即组建起一支 4 万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控制了许多重要军事要点，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大反攻期间，中央为了东北的尽快解放，先后派出 2 万名干部和十万部队进入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解放区。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我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大反攻取得了伟大胜利。共歼灭日伪军 398700 余人，缴获枪支 25 万余，火炮 1300 余门，收复县以上城市 250 余座，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同蒲、正太、陇海等 9 条铁路线，收复国土 315000 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 1800 多万。为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苏军提前出兵

1945 年 8 月上旬，苏联远东一带早晚已是充满凉意，按俄国人的历史习惯，8 月就已经进入了秋季。在 4000 公里长的“苏满边界”即中苏边界的东段，黑龙江中游和乌苏里江一线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在漆黑的夜幕和大雨的掩护下，百万苏军正在向边境运动。

此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伯力城，设在一座漂亮的五层小楼里的远东苏军司令部里异常忙碌。几天前正式就任的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坐在地图前，在运筹、在思考。

近一个月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案头最多的报告就是从欧洲战场调运部队的情况，长达万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停止民运三个月了，专供军用，可 40 个师的增援部队和相应的大批物资却还没有运完，此时华西列夫斯基是以“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的。实际工作使他感到，这一身份仅有“协调”使命，名不正言不顺，既无法对各方面军发号施令，又无法对地方党政组织实施领导，于是，华西列夫斯基通过总参谋部向斯大林建议，能给他一个合法的指挥名义。

7 月 30 日，苏联最高统帅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下属三个方面军，共有 11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3 个空军集团军和一个战役集群。加上苏联国境警备队等共有 156 万人。

就任后的华西列夫斯基感到真是强兵在握，对日作战心中有了些底数。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满洲的敌情民情，他还专门请来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最高领导人周保中，请他介绍所掌握和最近侦察到的东北情况。

详细掌握了敌情，自己又有了雄厚的实力，华西列夫斯基信心大增。此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不足。要通过仅有的一条铁路调运大量补充人员和物

资，又要把刚刚从港口卸下的美国物资分配并运交各参战单位，都需要充裕的时间。可是斯大林一再催促尽快完成准备，于是华西列夫斯基每天拿起电话，对各单位说的话都是：“要更快些，更快些……”

8月5日，他接到了斯大林下达的命令：“限于8月11日前完成各项准备，等待最后命令开始进攻。”

可是两天后，8月7日下午4时，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收到一份紧急命令。斯大林要求“从8月9日起开始对日作战。”

斯大林的命令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就是说，按最快准备时间已经限定的时间表又要提前两天。作为长期在总参谋部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来看，进行这样一场需要精心准备的大战，提前一两天按照常理而论并没有太大必要。现在突然要提前，显然有什么重要事件出现，或有某种出于军事需要之外的政治目的。

华西列夫斯基的感觉没有错，斯大林决定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天发起进攻，确实与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有关。

当远东的苏军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约定向中国东北边境开进，对日开战的准备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之际，驻太平洋基尼安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内也是一片忙碌。

7月中旬，美国接到从瑞士的秘密渠道转来的日本媾和方案，里面有两个基本条件就是：保留日本的天皇制，敌国发表某种保全日本面子的声明以实现“体面的和平”。至于前一条美国其实已作出保证，关键是后一条“保全面子”，也就是要求美英取消“投降”这个字眼，由日本自己在停战时宣布：

“如果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其占领权，放弃在占领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将主动撤出这些地区的日本武装力量……日本准备接受大量削减军备的要求，以国防需要的最低限度为满足。”

这实际是一个只承认放弃海外占领地而不肯投降的条件，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其助手们感到日本当权者真是顽固不化。于是杜鲁门下令，刚刚生产出来的三颗原子弹除了一颗用于实验外，代号“大胖子”和“小男孩”的两颗都运往太平洋上的基尼安岛，准备将这种人类战争史上从未用过的炸弹丢到日本人的头上。

1945年8月6日清晨7时，日本濑户内海北边的广岛响起了空袭警报。在这座当时有40万人口的城市里，没有多少非常重要的军工企业，因此一直未遭到大规模空袭，市民们也大都没有向外疏散。这种情况，在当时普遍遭受空袭的日本城市中是比较少见的。广岛市民不会想到，正是自己城市未遭空袭破坏的完整性，才成了美国首脑选择来检验自己新式核弹威力的首要目标。

8时左右，有的广岛市民发现天空有一顶降落伞从飞机上飘落下来，却都没有在意。8时15分，当降落伞到达离地面600米时，突然有一道极耀眼的强光照亮了全城，随之出现了一个直径数百米的巨大火球，相当于近2万吨梯恩梯炸药当量的冲击波使城内多数房屋迅速被摧垮。日本人普遍还不知道的核炸弹——原子弹此刻终于降临到他们头上！

8月6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苏联的态度马上显得更积极。看到日本已崩溃在即，此时必须抢时间参战。8月7日，即斯大林下令于两天后对

日开战的当天，苏联外交部通知日本驻苏使馆，次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将会见佐藤大使。

8月8日莫斯科时间16时50分，也就是东京时间当日22时50分，焦急的日本驻苏大使提前赶到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当佐藤尚武大使走进门，戴着眼镜、面色深沉的莫洛托夫并未像往常那样先寒暄几句，在佐藤准备开口时又挥手制止了他。

接着，这位被西方外交人士称为“锤子”的莫洛托夫冷冷地说：

“我代表苏联政府，交给大使先生一份致日本政府的正式宣战书，苏联也加入了7月26日《波茨坦宣言》的签字国之列，并认为自己从8月9日起已进入对日战争状态。”

此刻，按东京时间计算，已是夜里23时，距离开战只有1个小时。佐藤大使将此宣战通知传到东京，又是几小时之后即8月9日早晨的事。所以苏联虽然在名义上是8月8日对日宣战，9日发起进攻，实际上达到了突然袭击的效果。

与此同时，作为远东军事行动负责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接到提前开始对日作战的命令后，也已注意到了当时的新闻，他已隐约地感到提前进攻时间与国际问题密切相关，作为总司令他必须尽力去执行好最高统帅的命令。

经过两个不眠之夜，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8日晚，华西列夫斯基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接近12点，于是对身边的参谋们说：“通知各方面军，按原计划行动。”

几分钟后，命令通过电话传达到各方面军指挥部。像压紧的弹簧一般紧张待命的前沿进攻部队，立即像协调一致的机械那样起动。在黑暗之中，第一线的步兵也一个一个传送着“出发”的口令……

捍卫胜利果实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行到第八个年头。1945年8月8日，苏联决定出兵。次日，中共中央确定大反攻开始。10日就传来了日本乞降的喜讯。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将过去。

在得到胜利喜讯后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谁摘？”

到会的干部们发出了一阵哄笑，然而大家马上又感到严峻的斗争正摆在面前。

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展开了斗争。除了政治上的公开宣传、发布命令外，毛泽东在这一紧张时刻又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指示。这些指示，是各战略区实施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在全局部署上的底盘。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确定了当时的主要行动目标是：

“目前阶段，应以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命令还强调：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在8月10日至11日那个不眠之夜，延安的许多窑洞里都是灯火彻夜通

明，各战略区的领导人都在根据本地区的任务，制定夺取各大城市的计划，并马上通过电波把命令传达到千里之外的各军区。

晋察冀军区下达的命令是：准备夺取北平、天津、保定、石门(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并与苏军会师，准备相机进入东北。

山东军区下达的命令是：准备占领济南、德州、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交通要道。

晋冀鲁豫军区下达的命令是：准备协助晋绥军区夺取太原，并准备占领开封、新乡、归德(商丘)三城。

晋绥军区下达的命令是：准备夺取太原、归绥(呼和浩特)。

在皖东的新四军军部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即下达了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攻的部署，还任命了上海、南京等市的市长。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行动，发动工人准备进行起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行动的同时，过去在抗日战场上消极应付的国民党当局倾巢而出以极快的速度前来抢夺胜利果实，并阻挠解放区军民的对日攻势。

8月11日，重庆中央社以广播的方式公布了蒋介石下达的两个命令。一个是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命令，一个是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则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在此前一天即8月10日，蒋介石还下达了《对沦陷区的地下军、伪军的命令》，其中强调：“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

三个命令，立场何等分明！恰如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比喻的，八年血战的成果如同桃子，如今是果熟时节，蒋介石过去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却要下山摘桃，同时不许解放区军民收获这些成果。反而要伪军“维持地方治安”，并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这怎能不使解放区军民感到无比愤慨？

由于蒋介石的命令和日伪方面的态度，使形势的变化不尽如原先的想象。8月12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又改变决心，提出“江南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的新部署，要求新四军停止执行攻击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命令，向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展。

根据形势及时改变行动方针，这正是毛泽东所一向倡导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根据中央的新方针，一面继续大造攻击上海、南京等城的声势，使日军和伪军急忙向这里收缩，一面迅速全面出击，占领了大量县城和乡村。

当时，中共中央曾试探过争取敌后战场上的日军和伪军缴械投降，进攻前一般都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式。8月11日延安总部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5日，当日皇公开广播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又下令给在华日军统

帅冈村宁次大将，要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涉及其他区域。

然而8月15日当天冈村宁次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其“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随后，他又得到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关于只能向蒋介石所属军队缴械的通告。

更令人愤慨的是，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不仅拒不向解放区军民缴械，还在部分地段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反攻，夺回了刚刚放弃的山西省的文水、山东省的即墨、江苏省的海门等10多座县城以及部分交通要点。此后，日军又为国民党军的空运、海运和陆路进军提供掩护。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为打乱国民党调动兵力进行内战的部署，并迫使部分日军和伪军投降，只能在各地继续向日军和伪军展开攻势，以夺取广大地区并截断主要交通线。

从9月份开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原先的正面抗日战场上，一派和平气氛，国民政府军在日军合作和伪军欢迎下迅速地安然开进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在原先的敌后战场上，战火仍未熄灭，日军和伪军仍联合坚持在过去的炮楼、工事里，手持武器抵抗解放区军民的反攻。战时就泾渭分明的两个战场，此刻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状况。

考虑到美蒋垄断受降权，大城市已经难于夺取，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就攻取城市一事强调指出：

“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中又解释：

“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今后一个时期应夺取中小城市。”

大城市和要道不能属于八路军、新四军，可是在“力争”二字下，解放区军民还是捍卫了胜利果实。在华北方面八路军采取攻势，从8月9日至9月2日共收复了100多个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包括烟台、威海卫、龙口、益都、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威震华北，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利地位。新四军占领了江苏中部、安徽中部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许多县城，造成了极好的形势。

光荣的密苏里舰

1945年7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统帅斯大林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小白宫”会谈，这次会谈通过了《波茨坦公告》，10天后以丘吉尔、杜鲁门和蒋介石的联合名义发表。

《波茨坦公告》指出：“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宣言最后勒令：“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8月6日，一具巨大的降落伞由日本广岛上空款款下落，刹那间强烈的白光爆闪，以迅猛下及掩耳之势抓住了整个城市，巨大的蘑菇云腾向天空，广岛市沉入了汹涌的火海，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

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次日零时一过，苏军飞机突然空袭关东军各

处阵地，接着重型大炮铺天盖地地齐发，百万红军分四路，以绝对的优势和仇恨，向关东军展开了攻击。

9日，中共代表人物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庄严号令。

此时已形成了强大的四国对日战。

面对这一处境，9日上午，日本铃木首相根据天皇的授意，主持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上关于战与降又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场里仿佛埋着炸弹，在刀剑悬顶似的气氛中，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执之后，在幽暗的光线中，会场陷入了痛苦的沉默，就这样进行了一天之后。其结果是议而未决。的确这是一个难题！最后的办法只有“仰求圣断”请天皇作最终的裁决。无疑天皇也被逼上了崖角。

晚上天皇亲驾会场，倾听各方意见，争执的双方此时已是刀光剑影了。直到次日凌晨2时仍无结果。最后天皇不得不作出圣断。他稍稍向前探了探身子，站了起来，语调平静地说。

“朕赞成外相之主张。”他停下来，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擦了擦眼镜。接着缓慢地说下去。

“试顾吾国现状与列国形势，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延长世界人类的流血和残酷行为。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故此际唯有忍受一切，结束战争。”沮丧的暗流在会桌周围蔓延，有人伏在桌上哭泣起来。

“我想，让忠诚的军队投降，解除他们的武装，是难以忍受的事情；处罚战争责任者，因为他们也是尽忠之人，所以也是难忍之事。但是，要拯救全体国民，维护国家大政，对此必须忍受。当我回忆起甲午战争后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的心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批准接受《波茨坦公告》。”

15日，日本天皇宣读了《终战诏书》。

这是历史的决意。

1945年9月2日清晨，横滨天色迷蒙，雨云低垂，仿佛阴沉着脸。这里曾经是炫耀一时的帝国舰队的主要军港，现在却停泊着强大的盟军舰队。

在幢幢舰影中，有一艘显得格外巍峨雄壮、耀武扬威。它是一艘4.5万吨的战列舰，舰长800尺，装置有16寸大炮9门，其它小型炮几十门，火力范围及20哩。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四艘战列舰之一，堪为美国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象征。重要的是，它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故乡“密苏里”命名。

一艘驱逐舰驶近距海岸6海里远的“密苏里”号。美、英、中、苏等国的受降代表和盟国的海陆空将领先后登上了“密苏里”号的甲板。

又一艘驱逐舰驶来。它是“兰斯多恩”号，载着11名日本的投降代表。首席代表是曾两任外相，又为现任外相的重光葵。他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脖子上系着考究的宽领带，戴着白手套的手拄着一根文明手杖，显得斯文而高贵。但他那条不争气的假腿却把他的形象弄得丑陋不堪，委实叫不肯趴下的日本式尊严大丢份儿。外相在从后甲板上顶层甲板的扶梯时极为狼狈，每蹬一步都得哼唧一声。

重光葵被几乎所有的人以“一种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拄着拐杖，挣扎在痛苦的路途。跟在他身后的梅津大将并不理会他的苦楚。与重光葵相反，梅津穿一件皱巴巴的制服和骑兵马裤，头戴野战帽，脚踏长筒靴，衣装邋遢带有蔑视的意味。他铁块般的神色透出满腹的仇恨。他仇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走在前面的这个里通外国的主和派。最后还是一个美国人居高临下地拉了重光葵一把。

8点整，海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进行曲，美国国旗在乐曲声中冉冉升起。这面特意从美国用专机空运至此的旗帜，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伯利炮击日本、强迫日本与欧美列强通商时悬挂的那面。

8时40分，中国代表徐永昌一行6人和各国代表团成员走出了舱室。

簇拥在舰首和第二炮塔周围的280位各国战地记者紧张起来，他们知道，他们期待已久的一幕即将开启。

8时45分，战功赫赫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步出海军将官室，带领尼米兹五星上将和海乐赛上将，来到威力极猛的16寸大炮炮筒旁。军乐顿时大作，全体军官向总司令敬礼。

这位表演欲极强，一生都像在作戏的美国五星上将，穿条烫得笔挺的裤子，上身却随便套了件敞开衣领的卡叽布衬衫；手里拎着根褐色曲柄手杖。随便而简朴的衣着，带有刻意装扮出的与众不同。而他装腔作势的言谈举止，更是像他那充满华丽辞藻的文体一样矫揉造作。

右舷甲板中间摆着一张长8尺宽2尺的长方形桌子，桌上铺着青色绒布。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史巴兹、魏德迈、史迪威等美军高级将领以及58名随员站在桌子的右边；桌后正面以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为首。依次排列着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代表。

重光葵、梅津等一行11人在桌子对面站定。另外的人为3名陆军军官，3名海军军官和3名政府官员。军人穿卡叽呢军装，未佩带军刀。

9时正，受降仪式开始。

首先是特别规定的“羞辱5分钟”的程序。日本人在全体盟国代表严厉的目光下站立着。此时，天气并不很热，可这几个日本人都在不断地冒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中最难熬的恐怕是梅津，他曾坚决拒绝来此签署投降书，并以剖腹自缢相胁。

5分钟后，麦克阿瑟将军走到麦克风前，发表简短的书面讲话。

“我们各交战国的代表聚集在这里，签署一个庄严的协定，从而使和平得以恢复。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正在战场上见分晓，因此我们无需在这里讨论或争论。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也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精神相聚的。”

麦克阿瑟读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接着继续念下去：“我本人真诚地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以庄肃的语调说毕，即令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重光葵神色黯然地拐到桌前，在椅子上沉重地坐下，脱去帽子和手套，摸出钢笔。他木然地做完这些，眼睛就散了光，显得呆头呆脑地像个白痴。侧立一旁的美军军官顿起反应，他们有的疑惑，有的愤怒，有的竟骂出了声：“快签！他妈的！快签！”

弄得他更是呆若木鸡。

站在桌子另一边的麦克阿瑟见状噘了噘嘴，对身边的斯萨兰德总参谋长说：“你去告诉他在哪儿签名。”

重光葵签毕，梅津以帝国大本营的名义签了字。

随后由盟国代表签字。

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又抓住了一个作戏的机会。

他为签字准备了5支笔，并让从日本集中营刚恢复自由、惊魂未定的温赖特将军和白西华将军站在他身旁。他神气十足地坐下来，用第一支笔写下Doug，转身将笔赠予温赖特将军；用第二支笔写下Las，转身赠予白西华将军。第三支笔写下了MacArthur，另两支笔签署了另一份投降书。后三支笔中一支黑色的归美国政府档案馆，另一支黑色的赠给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还有一支红色的笔，他留给了自己的夫人。

盟国代表第二个签字的是尼米兹将军，他代表美国。中国的徐永昌将军、英国的布鲁斯·布莱梅将军、加拿大的穆尔-戈斯格罗夫上校、法国的雅加勒克莱尔将军、荷兰的赫尔弗里希将军、新西兰的艾西特将军，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

“让我们祈祷，”签字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再次表达他的美好愿望：“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

南京傀儡政府的收场戏

1945年8月10日，关于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沦陷区各大城市。在那个中国大后方惊喜狂欢之夜，在侵华日军总部和伪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倒是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这里仍然受八年前血淋淋的残酷大屠杀的阴影笼罩，8月10日晚间以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只是私下在民间传递。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消息得到证实，当满城的日本官兵都如丧考妣般地惶惶奔走，到处焚烧可能成为战争审判的罪证材料时，庆祝的鞭炮声才在一些小巷中响起。一些当年屠城中的幸存者，此时热泪盈眶。不过引起全市惊骇的倒是伪政权内一些派别为争夺市内控制权而向“中央”邀功，在一些地段展开了枪战。随后，日军又出动到街道上“维持秩序”。已经宣布战败的侵略者此刻还晃着白光闪闪的刺刀，这无疑是在提醒南京市人民，“天还没有完全亮”。

此时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确实是各揣心腹事。在8月16日原国民党政府的大院内，正在演着一幕收场戏。为争取市内控制权和向“中央”邀功，众汉奸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这个由汪精卫网罗20余名叛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50多名国民党军将官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以刺刀支撑于1940年正式建立起来的地道的傀儡政权，其所属的机构只存在于沦陷区内，由各级日本顾问“指导”，完全是日军用以统治中国人民和征粮征税的工具。在侵略者蹂躏祖国大片河山时降敌，还恬不知耻的以“和平运动”的谬论为自己卖国求荣行径辩解。声称因中国打不过日本，抗战必败，再战必亡，由他们出面与日本讲和，才能“保护民众”，并可通过和平方式从日本占领军手中逐渐收回权益，以此来“曲线救国”。对此番汉奸理论，重庆国民政府一位参议员曾形容说——

“南宋秦桧主和，并未投降金人，犹受千载唾骂。如汪道等，其行径乃在秦桧之下，乃石敬瑭、刘豫之徒。此等历史上少有之大汉奸，当然为全国国民所共弃。”

如今，日本主子垮了，虽然陈公博等人还硬说自己的曲线救国与重庆国民党局的直线救国是殊途同归，可谁都明白所谓“和平运动”的丑剧在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事实面前已经是罪不可赦。

当时在伪政权内部，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首先发生争斗。

多少有些书生迂腐气息的陈公博从 20 年代就是汪精卫的亲信，跟随左右亦步亦趋。抗战开始后不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随汪精卫一同叛国。到了 1943 年夏天，他见日本大势已去，他才派人到重庆向戴笠送信并转告蒋介石，表示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

重庆方面此时却看不上这个汉奸名气很大而又没有实权的家伙。当时戴笠就向蒋介石建议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的首脑，这事不要理他。”蒋介石也明白，胜利之后为了向国人显示自己“抗日英雄”的政治姿态，总要惩治一些汉奸，仅次于汪精卫而位居伪政权二号人物的陈公博不能不办。何况陈本人又没有实力，拉拢这个手无缚鸡之力且无军权的文人，对接收并无大用，政治影响上又对自己不利。此后，军统对陈公博虽也派人联系过，却从未许过愿。

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陈公博连续发了几封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出面“维持治安”，可是却一直未收到答复。

地位仅次于陈公博的周佛海，此时早与重庆方面建立了密切关系，显得胸有成竹。周佛海在历史上从来是个见风转舵、投机成性、毫无气节的家伙。20 年代初他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回国后见国民党给他厚禄高官，又背叛了共产党。大革命时他随北伐军到了武汉，一时又跳到极“左”立场上，没几天他转向极右，后来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写了一篇记述“逃出赤部”的文章。以至汪精卫都对人说：“这个周佛海，他过去当过共产党，现在去骂共产党。你们以后切不可与这样的人共事！”抗战开始后，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与陈布雷并列为蒋介石的“文胆”。可是看到武汉失守，日本又大力诱降，这个朝三暮四的周佛海又追随汪精卫投敌。投敌之后仅过了三年，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前景不妙，这个官居南京伪政权第三位的家伙又感到押错了宝。他随后又与军统头子戴笠建立了联系，并派代表到重庆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也通过戴笠向周佛海表示，要他切实掌握武装，以实力控制江南，将来待日本失败时完整交给中央，防止京沪为共产党所占。这种在反共的大前提下互为需求的关系，使双方一拍即合。

此后，周戴二人信频书繁，称兄道弟。甚至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马上赶赴灵前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拍下照片秘密送给周佛海。虽说这一举动带有做戏的色彩，却也使周佛海感激不已。1944 年 11 月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后，无兵无勇的一介文人陈公博坐上了南京伪政府的第一把交椅，给了周佛海一个行政院长即相当于总理的头衔。此时周本人对此已不感兴趣，只是一心抓兵权，并坚持身兼上海市长一职，平时根本不去南京。在他想来，乱世之中只要有军队有地盘，才能以实力向重庆方面邀功。于是，周佛海一面将财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一面要税警团及沪杭一带的其它伪军直接听命于自己，一时成了长江下游沦陷区内最有实力的汉奸。

8 月 9 日得知苏联出兵的消息后，次日周佛海以上海市长的名义发出布告，禁止市民随便议论。此时他虽然明白日本即将失败，却估计至少在半年之后。可是 8 月 10 日晚间从无线电中传来日本乞降的消息，这个大汉奸立即变得极为紧张忙碌。他马上通过军统设立的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又急忙赶

赴南京与陈公博等人磋商。他还对心腹们说：“政府一定应该迅速解散，我所能为力的，也只能随机应变。”

此时在周佛海看来，宁沪一带为新四军的根据地包围，国民党部队则相隔甚远。他不仅有上海市长的职位，手下还有中央税警总团，另外一些伪军将领也能听从其招呼，不像陈公博是光杆司令。如果能为蒋介石保住南京、上海，不被共产党接收，日后就可以得到蒋介石的宽容谅解，说不定还有重新飞黄腾达的可能。

果不出周佛海所料，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对他和伪上海市公安局长罗君强发来委任。虽然重庆方面的报纸一律不登这些任命，南京、上海一带的报纸却立即刊登了消息：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并指挥驻杭州的伪军第12军及伪地方团队，负责维护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周佛海自感有恃无恐，立即不把陈公博放在眼里。

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召集众汉奸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到会者一致同意宣布伪政府解散。

随后，陈公博又摆出往日的“主席”架子，要求再“讨论一下人事问题”，也就是再以他为首建立起“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的新班子，控制全局好向重庆方面交待。

勉强来南京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却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声“这样就行了！”马上拂袖而去，接着几个掌握军权的伪军头目跟着走出去，把目瞪口呆的陈公博甩在屋里。

可见，众汉奸之间为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争“功”邀宠，又演出了日伪集团末日的一出闹剧。

日本战犯应有的下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诏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日本战败投降而胜利结束。

为惩处和审理日本战犯，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该法庭由中、美、英、苏、法、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中国国民党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其代表团成员有梅汝璈法官（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滩检察官（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裘助恒、方福枢、杨寿林等法律专家和刘子健历史学家。同时还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倪征燮为首席顾问，著名律师鄂森、桂裕及精通日语的吴学义为顾问。中国代表团为惩办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做了大量工作。11国作为原告，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出起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都市之谷陆军省（原大本营所在地）大楼内。东京审判长达两年又7个月，公开庭审818次，秘审131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法庭出理的书面证据达4336件，书面证人779人。1948年11月12日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中的25名（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因在押期间病亡，大川周明发精神病，法庭决定解除审理）战犯进行宣判，最后的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几十万字。25名日本甲级战犯经庭判，判刑如下。

判处绞刑 7 人：

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判处终身监禁 16 人：

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宣、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畑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

判处 20 年徒刑 1 人：

东乡茂德。

判处 7 年徒刑 1 人：

重光葵。

1948 年 12 月 23 日凌晨，东条英机等 7 名死刑犯，在东京巢鸭监狱内的行刑室处以绞刑。其骨灰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撒入大海荒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严惩了日本甲级战犯 25 人，为人类伸张了正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包括美、英、法、荷、澳、菲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等国，从 1945 年 2 月至 1949 年 12 月分别设立了 50 余处特别法庭，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审理日本乙、丙级战犯共 5690 人，而被判刑的有 4403 人，占在押战犯的 77.4%，无罪释放和其他处理的 1287 人，占 22.6%。判刑罪犯中被判死刑 971 人，占 22%，被判无期徒刑的 479 人，占 11%，被判有期徒刑的 2953 人，占 67%。

冈村宁次为何逍遥法外

公元 1945 年，日军投降后，中国派遣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一下跌到了战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战犯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一号战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也将他同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引渡到东京审判。

舆论界不断地掀起风云。

昔日里凶悍、残酷的冈村宁次此时以双肘撑着他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嘴里不停地喃喃“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然而他不甘心束手待毙，他要制造骗局，在混乱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他十万火急地致电蒋介石：苏蒙军队已进抵张家口，呈向平津挺进态势；华北解放军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势极其猛烈；此乃共军在苏蒙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之后，他又不无威胁地说：如果仅是华北共军进攻，他可以按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抵抗，但如果苏蒙军队参与联合进攻，他的军队只能撤退。

冈村宁次的报告果然引起了战胜国的统帅蒋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麦克阿瑟。

冈村宁次见此招颇灵，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的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 30 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军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它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

蒋介石以大人物的风度，抖落黑大氅，登上一座小山头，展示了他宏大的眼界：“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国父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长期共荣。

目前看来，实为重要。”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期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层出不穷的野蛮战术，早就受到蒋介石的仰慕。其时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的蒋介石心里发虚，他需要冈村宁次的帮助。

可是国人们却不理解这位蒋委员长的良苦用心，国际国内的风声日紧。这点让蒋介石好不为难。

为了把这个大战犯掩藏好，蒋介石拿出他在上海滩上练就的看家本领，施展了障人眼目的魔术。他要在阳光下藏住黑影。

于是 1945 年 12 月至 1947 年 10 月，冈村宁次被安排担任“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班长”，名目是处理日俘日侨遣返事宜，实际上他在做两件事，一是当蒋介石的高级顾问，盘算国军怎样才能不挨共产党的打，怎样对付共产党。二是拉关系走门子，替他的同胞战犯们鸣不平。

到了 1947 年的 10 月，联络班的人因无事可做都回国了。冈村宁次一个人支撑着空空荡荡的联络班。其实，不如说联络班在支撑着空空荡荡的冈村宁次。

为什么还不审判冈村宁次？民众和舆论界越来越急迫地发出质询与抗议。因为冈村宁次在侵华期间，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那残忍的智慧、恶魔的禀性，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人们怎么能忘记他呢？

人们不会忘记，冈村宁次自 1941 年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为了镇压沦陷区人民，他别出心裁地推行“治安肃正”运动，把华北分为日军占领的“治安区”、建立了根据地政权的“非治安区”和双方争夺的“准治安区”，对三种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残暴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加强掠夺物资和奴化人民；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的人民赶进“人圈”，毁掉原来的村庄，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的联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河北省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大屠杀中，全村有 1035 人遇害。在阜平县的平阳村持续屠杀了 87 天，700 多人魂断。他曾调动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共烧毁民房 15 万间，抢掠粮食 5800 多万斤、牲畜一万多头，杀害抗日军民 4500 余人。

比之一般的恶魔，冈村宁次更擅长使用残忍的智慧。在“扫荡”中，他怪招迭出地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异战术，什么“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等，尽管在与八路军试阵时连遭败绩，却足以使蒋介石眼花缭乱，自叹弗如，钦敬有加。

所以蒋介石要把他当成个宝贝来保护，而为这个宝贝蒋介石也确实费尽了心机。换句话说，庇护冈村宁次也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曾让与冈村宁次一样有着一颗秃光脑袋的蒋介石，在他那光脑袋上，多浸了几次汗液。

无奈，看来审还是要审的，过场该走还是要走的，蒋介石又一次拿出了政治家的风度。

而蒋介石的心思被监狱长孙介君看透了，在审判之前，他带着翻译捷足先登了。见到冈村宁次他不无讨好地说：

“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不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

可根据病情请示保释监外治疗。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既然是狼狈为奸的一出戏，那就要配合着演才好。而且还要发旁听券，招待中外记者。外交使团和国内社会名流。敲锣打鼓，鸣金放号，大戏要开演了。

1948年8月23日上午，上海吴淞路商会礼堂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极为冷峻。礼堂内聚着一千多名前来旁听的中外人士和新闻记者，座无虚席，坐在第一排的两名全身戎装的少将高参显得尤为突出。

这一情况，使得庭长石美瑜感到纳闷，过去在南京审判战犯，国防部从未有人来旁听，此次远在上海，国防部缘何反倒派人来旁听了呢？

石美瑜号可珍，福建闽侯县人，曾因民国二十一年在司法考试中名列榜首而声名雀起，原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焕彪的班底之一，任刑事庭推事。战后在承办陈公博、缪斌等汉奸案中，锋芒锐利，刚正执法，出手漂亮利落，广得同行老少的称道。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时，他被推荐升任为该庭庭长。官阶陡升三级，大大地鼓舞了他的雄心。此番他想抓住办冈村宁次这个难得的机遇大显身手，为自己铺下锦绣前程，同时也使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

然而，在他前面等待的是陷阱和沼泽，这点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这次审判是不会有结果的，尽管正义和善良的人们强烈要求惩治罪犯，但是国防部、乃至更高的决策者却在保护罪犯，在当时那暗淡的天空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石美瑜经过几轮的较量之后，深感自己的渺小而悲哀。

不久，石美瑜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代电，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首他的衔名与文末“中正”的署名、使他明白，蒋介石已将他提拔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衔至中将；而作为报偿，他必须帮蒋介石放了冈村宁次。船驶近了孤岛把你推下水，再抛给你个救生圈，由不得你不抱住救生圈往孤岛挣扎。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的公审。这是一次秘密的“公审”，只有20余位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3名律师有2名迟迟未到。法官们是心虚的，冈村宁次是胸有成竹的。

石美瑜：“请被告对检察官论罪理由进行申辩。”

冈村宁次：“本人对法庭审判无意见。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本人深表歉意；对于法庭因本人健康原因而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本人深表感谢！”

倍受感激的冈村宁次，这时也没忘了给蒋介石作脸。

中午休庭，本该去吃饭，可是石美瑜却把大家请进庭长室里，关紧房门，沉起面孔说：“今天辛苦诸位，让肚子受点委屈，先合议好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再吃饭。”

也许法官们还蒙在鼓里，大家议论纷纷：冈村宁次罪大恶极，即令九死也难赎万一！石美瑜苦叽叽地打断众人的发言：“案件拖了那么久，诸位怎么还没揣度出实情？”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两份命令，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一份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内容无异：“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宣判其无罪。”一阵冷风扫过，给众人的脸上蒙上了寒霜。

“那判决书怎么办？”其中一位脱口问道。

石美瑜苦笑。他从包里取出抄写工整的判决书，上面盖着国防部长徐永

昌的朱红大印。“据实以告吧，此案上峰已拍了板，我也是身不由己。现在请诸位在判决书上签字吧。”

气愤，痛苦，屈辱，困惑，法官们被骤至的严寒冻住了。石美瑜见状叹息一声，说：“诸位不肯签字，我也不能强迫。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国防部派来的5位法官已在隔壁房间等候，要是我们不签字，他们将立即接办此案，宣布重新审理，结果还是一样。而我们都得去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整个房间屏住了呼吸，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下午4时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开始宣读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国民37年度战审字第28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66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上述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2第3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即行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历时8年，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迫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即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为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动发生，然此应由行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沪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38年1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扯谎、诡辩、出卖、无耻！

被激怒的记者们不顾宪兵的阻拦冲了过去，向黑暗的法庭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然而，笔毕竟没有枪硬。

无罪！连冈村宁次也感到吃惊，大突然了，使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在他从后门溜出法庭的时候，肯定在心里暗暗地感激了一番他的老朋友蒋介石。

抗日，爱国。

高级将领杨虎城要求抗日，结果合家老少都没逃出蒋介石之手，对蒋介石菲薄的张学良将军呢，也被软禁了数十年。而杀中国人杀红了眼的一号大战犯冈村宁次却在蒋介石的竭力庇护下逍遥法外。这种绝对明显的两相比较，极生动地暴露了蒋介石一绩假抗日，真卖国的丑恶嘴脸。

然而蒋介石就是蒋介石，有时为了切实利益是可以不要脸面的。一年之后，他要大胆起用了。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一号战犯摇身变成了功臣。

中国大陆上最后一支日军的覆灭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就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头号敌人，昔日的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反而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对象。虽然他们不得不遣返在华日军，但是却仍留下了不少过去的战争罪犯，秘密地参加了打自己同胞的内战。

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更是明火执仗地进行着这种卑鄙的交易，竭力想把驻山西的日军第1军留下。

8月30日，阎锡山以“受降长官”之尊回到在他手中遭沦陷的太原城。次日即到日军司令部“专程拜访”。一见澄田、山冈等日军头目，阎锡山马上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建议，并说：

“我已正式受命为二战区的受降长官，希望阁下把在山西境内的日本军，一律交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二战区共同剿共，你看如何？”

澄田徐四郎一听，当即有些吃惊。随后与在座的山冈参谋长交换了一下眼色，回答说：

“阎阁下的意见很好，但事关重大，我们还得仔细研究一下，才能答复。”

第二天，澄田、山冈二人乘坐着按日本将军惯例上插黄旗的汽车，风驰电掣地开入第二战区长官部“回拜”阎锡山，并对昨天的问题答复说：

“山西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如留一部可以考虑，顶好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尤其对日本居留民，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全部留下，也无不可。”

听到这番回答，阎锡山多少有些遗憾。本想将拥有近6万人、装备齐全的日本第1军全部接收过来，现在只能留下一部分，自然于心不甘。于是，阎锡山又召集他的亲信开会，在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

“对全部日本人留用问题，我一再和他们商议，他们始终不敢接受，只说可以由我们‘个别发动’。我想，从他们的中下级来个‘个别发动，优予留用’的办法，还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的办法不可。现在我们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10万中国兵，也顶不住1万日本人。你们应该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

根据“阎长官”这一精神，他手下的官员立即分头动员日军中下级军官和侨民干部率部留下。

此时，山西的原日本军政头目中也有有一部分人鼓吹卧薪尝胆的复仇主义，动员日本人为复兴祖国而残留。原山西伪政府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第1军少佐情报参谋岩田清一等成为这个残留运动的头目。

期间，最嚣张的是原步兵第14旅团长元泉馨少将，他一向与解放区军民

为敌，在进行“扫荡”时犯下过许多血腥罪行，日本投降时他正率部驻扎在上党地区的沁县，在八路军包围下拒绝缴械，进行了一场他称为“尸山血海的死战”后突围到达潞安县。当得知阎长官对待日军的态度后，他拍案叫好，亲自跑到太原去见阎锡山。见面后，这个元泉馨就以武士宣誓式的口气说：

“我愿意脱掉日本军服，改穿晋绥军装，充当一名前线指挥官，协助阎阁下进行剿共战争，死而不悔！”

阎锡山当即对他大加勉励，引为“同志”，并封他为“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这个日本少将战犯，投靠阎锡山后反而立刻加衔一级。他所指挥的第14旅团，其官兵也被大部留下。

就这样，山西国民党军共留下了日军约1万人，这批日本兵还公开扬言：“我们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中国太君每月除供给吃穿外，还加倍发饷。”

山西国民党军如此大量留用日军打内战，不能不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的谴责。1946年1月军调处执行部成立后，中共代表坚决要求去山西调查此事，美国代表对此也认为不妥。加上这些参加“残留运动”的日本兵中有许多人思乡心切，常借故逃走。至1946年春，还剩下2600名官兵被阎锡山部留用，编为9个步兵大队、1个铁甲车大队直接参战，后来阎锡山又给了一个“第十总队”的番号。

在随后的山西战场上，当人民解放军向阎锡山部队发起进攻时，常常可以听见对方阵地上发出抗日战争中就熟悉的“斯斯枚——”（日语为“前进”）这种狼嚎般的声音。每听到这种声嘶力竭的吼叫，中国革命军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中烧！

“又是这帮日本鬼子！现在还帮助阎老西打咱们！”

“冲上去！彻底消灭他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打击下，这支改头换面的日军部队在战斗中逐渐地消失于山西战场。1948年6月中旬，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发起了晋中战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山西中部平原。阎锡山将看家的部队都投入了战斗，自然也未遗漏那个仅存于中国的日军部队——第十总队即“元泉兵团”。

7月16日，晋中战役进入最后一天。人民解放军开始对这支罪恶的队伍发起攻击。一颗颗炮弹准确地落在这支日军的阵地里，随着阵阵爆炸，元泉馨手下的官兵发出声声嘶叫，一个个地倒在残垣断壁之中。很快，喊杀声由远而近，指挥所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冲上来的解放军战士。水野参谋见形势危急，想向元泉馨提议将指挥所移到别处，可是他刚刚说出一句“阁下”，一颗炮弹就在指挥所的墙壁爆炸，屋里所有的人都被炸倒在地。当硝烟略散时，已经挂彩的水野跑到元泉馨身边，见自己上司的腹部已经被弹片划开，血流如注，正在地上做垂死的抽搐。

“水野……”元泉馨睁开眼，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此时，声音嘶哑，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话来。接着，他面部痛苦至极，用手势比着自己的脑袋，意思是再补一枪。水野用手枪在元泉馨头上补了一枪，这个好战罪犯的性命就这样结束了。

解放军的冲锋队伍如潮水般涌来，激烈的村落战随之展开。一部分日军在嚎叫中砸毁了迫击炮、掷弹筒，用刺刀拼杀，企图做最后的抵抗，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是怒火满腔，很快将日军的大部消灭。剩下的一部分日军面对着逼到面前的中国革命军队的刺刀，高举双手当了俘虏。这些犯有侵华和

参加中国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双料罪的日本军人，都被关押待审。

中国土地上的最后一支日军建制部队就此被消灭后，阎锡山仍使用留在太原城中的部分日本人充当炮兵和其他部队的作战骨干，一直顽抗到翌年 4 月太原解放。

当红旗插上太原城头后，残剩下来的日本人个个都乖乖地举手投降，成了俘虏。其中还有城野宏、河本大作等重要罪犯。

河本大作，是远东国际法庭取证时一直找不到的重要角色。他是 1928 年指挥皇姑屯炸车案杀死张作霖的日本宫廷党羽集团的重要人物，关东军高级参谋。

日本投降后，河本藏身于阎锡山的庇护之下，一面充当献策开发产业和搜刮民财的顾问，一面为进行的反共战争筹划后勤支援。这个臭名昭著的战犯这回却无法逃脱监狱之囚。他和另外 103 名被俘的日本军官一起，被关进了太原战犯管理所。不过未等到正式审判，这个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都臭名远播的河本大作就病死在战犯管理所中了。

